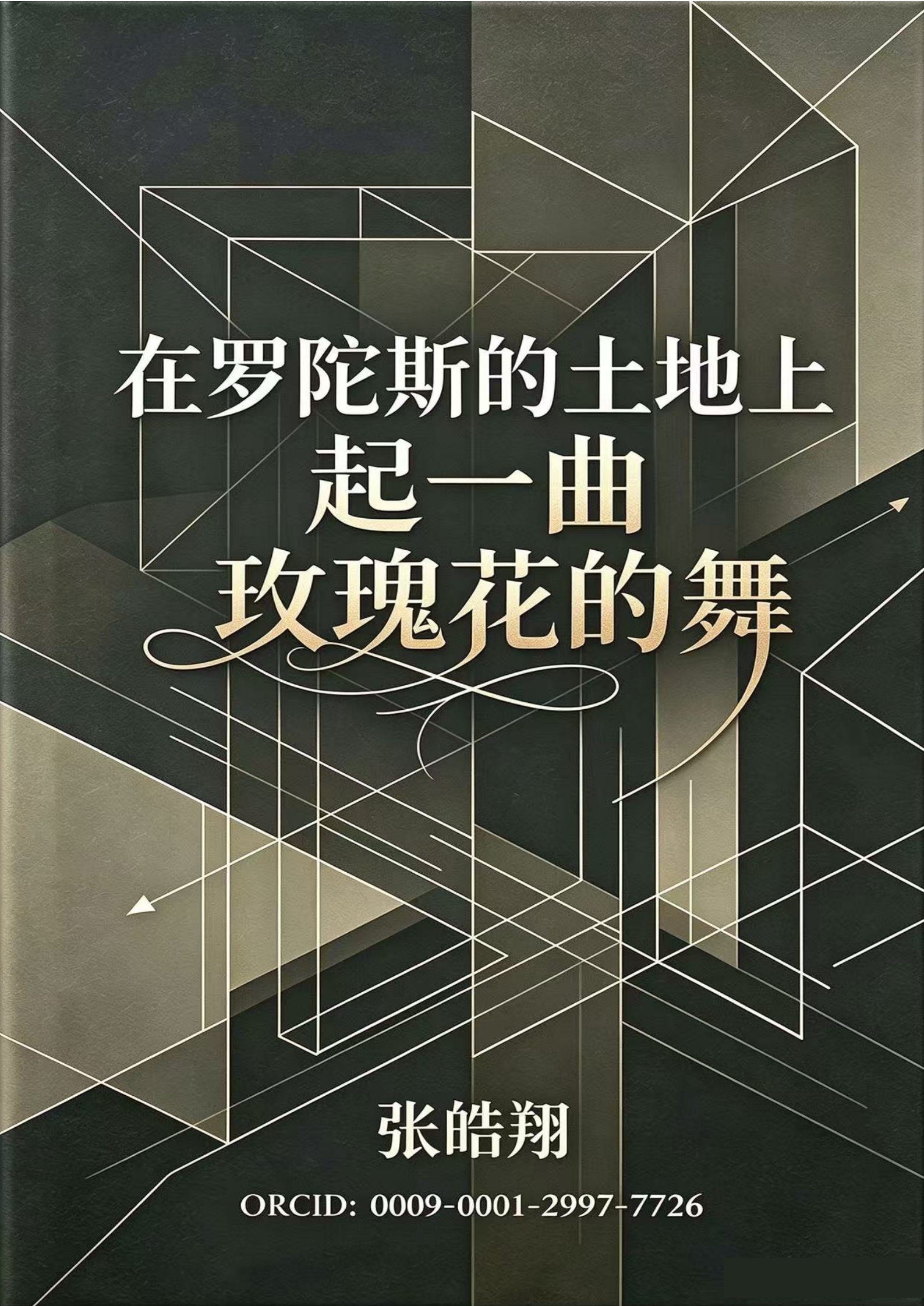




在罗陀斯的土地上 起一曲 玫瑰花的舞

张皓翔

ORCID: 0009-0001-2997-7726

在罗陀斯的土地上起一曲玫瑰花的舞

作者简介：

姓名：张皓翔

邮箱：nyzhanghaoxiang@outlook.com

ORCID: 0009-0001-2997-7726

前言

这本书要回答是一个看似过时、却又每天横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阶级斗争，是否过时？

打开今天的报纸，刷过今天的屏幕，我们很难看见它。我们看见的是女性为自己的身体而上街，看见环保主义者躺在推土机前，看见某个性别、某个性取向、某种肤色的人群为自己的尊严而呐喊，看见一群素未谋面的人因同一种爱好、同一种审美、同一种对世界的细小偏好而结成紧密的共同体。我们也看见国家与国家相互敌视，看见旗帜与旗帜在边境两侧飘扬，看见“我们”与“他们”的界限被一再地重申。我们唯独不太容易看见那种十九世纪式的、工厂烟囱下的、西装革履者与粗布衣衫者正面相向的、以“阶级”两个字直接命名的斗争。

于是有人宣布它死了。宏大叙事破产了，阶级这个范畴过时了，历史终结了。也有人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责备那些不再上街的人：你们贪图享乐，你们觉悟低下，你们对不起前辈流过的血。

这两种声音听起来截然相反，骨子里却共享着同一个前提——它们都把某一种特定形态的斗争，当成了斗争本身。

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掉这个前提。

我们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宣言》那句著名的论断一边：一切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¹。但我们同样坚定地补充一句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话：阶级斗争，从来就不总是直接地、赤裸裸地表现为阶级斗争。它有时披在民族的战袍之下，有时藏在身份的面具之后，有时又穿上爱好与审美的外衣。它是地火，是河床，是那个从不退场的底层逻辑；而出现在地表上的，永远是某一种被特定历史条件塑造出来的面孔。

这本书要写的，就是这张面孔的变迁史。

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分析变量——联结的引力机制。人要斗争，先得联结起来；而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那个“引力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是不一样的。在漫长的农业—封建社会，这个引力核心是民族；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它复归于阶级；而在我们身处的数字时代，它分裂为两端：一端是国家层面重新被动员起来的民族，另一端是个体层面以爱好、以本我特性为圆心的新联结。阶级斗争作为地火从未熄灭，只是它借以燃烧、借以显形的那个引力机制，换了。

我们将用这个变量，重新解释今天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阶级叙事会在物质生产最发达的时代反而沉寂？为什么女性主义、环保、身份政治会成为斗争的主要面孔？为什么对“群众不作为”的指责本身就是一种教条？以及，最重要的——这一切究竟通向何方？我们将论证：以爱好与个体特性为引力的新联结，本身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只要它不能重新把利益的引力核心发掘出来，它就不过是物质大解放撒下的一点残羹冷炙。而重新统一二者的，不是哪个政党的号召，而是矛盾运动本身——是人工智能正在掀起的那场我们必须直面的巨大变局。

¹ 马克思、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

这不是一本学术论文集。我们不打算在概念的迷宫里打转，也不打算用注释的密度来冒充思想的深度。这是一本政论：它有立场，它有判断，它敢于预言，也敢于为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它的全部方法只有两条——不问道德上的对错，只问一件事：这个东西是不是进步的？它构不构成矛盾的运动？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灿烂与苦难同源的历史。本书要追问的，是那把我们继续向前抛射的、最根本的力量，究竟以什么方式在起作用。

张皓翔
2026-9-25

目录

第一章 阶级斗争作为方法.....	4
第一节 地火与面孔.....	4
第二节 为什么利益是永恒的地基.....	5
第三节 引力机制的三段迁移.....	6
第四节 一个辅助性的变量.....	7
第二章 民族的引力.....	8
第一节 为什么火山口在民族那里.....	8
第二节 民族为什么比阶级更“好用”.....	9
第三节 被压在下方的地火.....	10
第四节 草原与农田之间的宏大戏剧.....	11
第五节 为什么奴隶和农民不能把斗争做成大事业.....	12
第六节 古代“民族”的真实质地.....	13
第三章 阶级的引力.....	14
第一节 蒸汽机把人集中到了一起.....	14
第二节 斗争组织者的转移.....	15
第四章 原子化与新联结.....	18
第一节 阶级叙事为什么沉寂了.....	18
第二节 一种“原子化”的联结.....	19
第三节 旧联结的三大支柱的坍塌.....	20
第五章 两种指责与一个标准.....	25
第一节 两种喧嚣.....	25
第二节 单看联结：这是历史的进步.....	26
第三节 需要的丰富，是人的丰富.....	27
第四节 残羹冷炙的警告.....	28
第六章 矛盾的展开.....	29
第一节 两种相反的要求.....	29
第二节 当“个性”本身也成了商品.....	30
第三节 人不能不联结.....	31
第四节 联结必然转化为斗争.....	31
第五节 旧貌换新颜.....	32
第七节 那些在身份与阶级之间摇摆的运动.....	33
第七章 引力机制的重新统一.....	35
第一节 矛盾的解决不能靠喊口号.....	35
第二节 AI：正在逼近的大变局.....	36
第四节 为什么它通向阶级斗争，而不是更深的原子化.....	37
第五节 自觉的工作与矛盾的必然.....	39

第一章 阶级斗争作为方法

第一节 地火与面孔

要理解今天，必须先把两件被人们搅在一起的东西分开：斗争的本质，与斗争的表现形式。

这一区分看似平淡，却是整本书的命门。过去一个世纪关于“阶级斗争是否过时”的几乎全部争论，都源于人们把这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事。当他们说“阶级斗争消失了”的时候，他们真正看到的，其实只是十九世纪那种特定斗争形态的消退；而当他们说“我们要回到阶级斗争”的时候，他们心目中那个要复归的东西，往往也只是十九世纪斗争形态的一幅旧照片。本质与形式被焊死在了一起，于是任何形式的变化，都被误读为本质的死亡。

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两者重新掰开。

什么是斗争的本质？本书毫不含糊地回答：是阶级的斗争。这不是一个需要重新论证的新鲜结论，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整个现代世界划定的那条基线。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一切有文字记载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会师傅与帮工，一句话，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²

这个论断，我们不准备重复它的每一步推导，因为那已经被一百多年的历史与理论反复打磨过了。我们只想把它的方法论内核点出来：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根源于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谁占有生产资料，谁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出去；谁在生产中发号施令，谁在生产中服从命令。只要这种分裂还在，只要一部分人凭借对生产条件的掌控，能够另一部分人的劳动为自己谋利，阶级斗争就作为一种客观的、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矛盾存在着。它不因为我们不提它而消失，不因为我们否认它而缓和，也不因为它披上了别的外衣而改换了本质。它是地火，在地表之下稳定地奔涌。

但地火要喷出地表，要烧出可见的地貌，却需要通道。这个通道，就是表现形式。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阶级斗争从来不是、也从来不必是，一上来就以“阶级”两个字自我命名的。一个罗马角斗士斯巴达克，他举起的剑，本质上指向的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但他和他的战友们聚集在维苏威火山口时，凝聚他们的旗帜，并不首先写着“无产阶级”。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他们喊出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中世纪的农民跟着某个自称“基督再临”的异端教士攻打城堡，他心目中的敌人是“假冒为善的教士”与“亵渎上帝的领主”。在这些时刻，斗争的客观内核是阶级的，但动员人们、把人们凝聚起来、让人们愿意去死的那个直接的引力核心，却往往不是阶级。

这就是本书要引入的核心变量——联结的引力机制。

人从来不是单个地面对压迫的。孤立的一个工人，无论他多么愤怒，都只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换掉的原子；只有当他与千千万万个和他处境相同的人联结起来，愤怒才成为力量，苦难才成为历史。而把这些分散的原子联结成一个整体的那个“引力核心”，就是我们所说的引力机制。它是问这样一个问题：人们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彼此认出了“我们”？是因为我们讲同一种语言、流同一种血、被同一个王朝统治？是因为我们在同一间工厂里做工、受同一个老板剥削？还是因为我们喜欢同一种小众的音乐、认同同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共享同一种难以被周围人理解的审美？

² 马克思、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

历史地看，这个引力核心不是固定的。它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随着人们生存条件的变化、随着人们可支配的时间与精力的变化，而不断地迁移。而我们要论证的全部秘密，可以提前一句话说尽：阶级斗争是地火，是不变的本质；而联结的引力机制，是地火借以喷发的火山口，是不断迁移的形式。地火从未熄灭，火山口却换过好几处。

第二节 为什么利益是永恒的地基

在进一步展开历史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躲不开的追问：凭什么说阶级斗争是本质？凭什么说不管斗争披什么外衣，它归根到底都是阶级的？这个问题如果不回答清楚，后面的全部历史叙述都会悬空。

答案，就埋在人存在的最基本事实里。

人首先得活着。要活着，就得进行物质生产——就得种地、做工、捕鱼、盖房、把自然物质转换成维持生命所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这一点称作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³

这句话朴素到近乎老生常谈，但它的理论分量怎么估计都不为多。它意味着：物质生产不是人类众多活动中的一种，而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地基。无论是哲学、宗教、艺术、政治、战争，还是女人为自己身体的抗争、环保主义者对森林的守护、一群人为某种审美的痴迷——这一切耸立在地基之上的大厦，都只有在地基已经打好、人们已经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才谈得上展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4

而物质生产从不是单个人孤立进行的。人在生产中必然结成一定的、不依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⁵。在生产关系中，人们分化为不同的阶级；而围绕生产条件、围绕劳动成果、围绕谁支配谁的劳动而展开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利益——更准确地说，由物质生产所决定的、人们对自身生存条件与生活资料的争夺与捍卫——是那个永恒的地基。我们可以不思考它，我们可以鄙视它，我们可以宣称自己超越了它；但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的肉体就仍然被它拽着。一个人可以为了理想绝食而死，但那个让他可以从容绝食、可以从容谈理想的前提，仍然是社会上已经有无数人在从事物质生产，仍然是这个社会没有在他绝食的那一刻就分崩离析。利益不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但它是那个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在远处校正一切的地基。

正因为如此，不管今天的斗争看起来离工厂、离工资、离“利益”有多么遥远——女性为生育权的抗争，环保主义者为北极熊的奔走，小众社群为被看见而发出的声音——我们都拒绝被它的表面主题所迷惑。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些斗争生长在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地基之上？它们背后那个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如何暗中塑形了它们的边界、它们的强度与它们可能的走向的？

这不是把一切还原为“钱”的庸俗做法。我们非常清楚，人并不只为面包而活；人还为尊严、为意义、为爱、为创造、为那些让人成其为人的东西而活。事实上，本书后面将要论证，恰恰是当面包问题被物质生产的巨大进步相对地缓解之后，那些更高的需要——爱好、审美、

³ 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德意志意识形态》

⁴ 恩格斯，1883，《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⁵ 马克思，185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个体的自我实现——才第一次大规模地登上历史舞台。我们一点都不轻视它们。我们只是坚持一件事：它们是在地基之上生长出来的枝叶，而不是地基本身。枝叶可以长得比树干繁茂，可以千姿百态，可以在某一个时代遮蔽住人们对树干的视线；但只要我们挖下去，那个把一切撑起来的、由物质生产与生产关系构成的树干，始终还在。

第三节 引力机制的三段迁移

把这个方法论前提确立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抛出本书的历史框架了。

纵观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联结的引力机制——也就是把人们凝聚成“我们”的那个核心——经历了一次大的迁移。我们将其粗线条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漫长的农业—封建社会。在这个阶段，宏观地看，民族的引力压倒了阶级的引力。历史上的地表上仍然存在这阶级的斗争的喷口——农民起义、奴隶暴动、佃户抗租从未断绝——但在历史的地表上，占据最大场面、左右帝国兴衰、改写文明版图的，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王朝与王朝之间的碰撞与战争。阶级的地火当然在流，但喷出地表的那个火山口，是民族为主。

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蒸汽机把农民从土地上连根拔起，集中到工厂的烟囱之下。第一次，人数庞大的劳动者不再分散在彼此隔绝的村庄里，而是成百上千地挤进同一个车间、同一条街道、同一个居住区。他们的生存条件第一次如此直接、如此鲜明地由“资本—雇佣”这条关系所定义。于是引力核心复归于它的本位——阶级。这是一个工人可以直接指着老板的鼻子说“我们”与“你们”的时代，是宪章、是 1848、是巴黎公社、是《国际歌》响彻欧罗巴的时代。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身处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的引力似乎退潮了，联结的核心发生了一个奇特的分裂：在宏观的国家层面，民族的引力以新的形式重新抬头；而在微观的个体层面，引力的圆心前所未有地向内收缩，收缩到了每一个人的爱好、每一个人的审美、每一个人的本我特性之上。女性主义、环保、各色身份政治、各种小众爱好的隐秘共同体——这些就是这个阶段的地表景观。阶级叙事被唱衰了，宏大叙事被宣布终结了。

本书接下来的全部任务，就是把这三个阶段逐一展开，说明引力机制为什么会这样迁移；然后，把最大的篇幅留给第三个阶段——它究竟是不是退步，它进步在哪里，它的矛盾又指向何方，以及它将如何被一场正在逼近的巨大变局重新拽回到阶级的地基之上。

在进入历史之前，还有一个方法上的立场必须先讲清楚，否则我们后面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误读。

我们的理论，从来不问道德上的对错。

这一点极其重要。面对今天光怪陆离的斗争形态，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立刻掏出一把道德的尺子：身份政治是错的，因为它分裂了工人；群众是堕落的，因为他们只顾享乐；民族主义是坏的，因为它转移了视线。本书拒绝这种裁判官式的姿态。我们只问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东西——不管它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还是今天的身份政治与爱好联结——在历史上是不是进步的革命的？它是不是代表了物质生产的更高发展、代表了人的解放的更进一步？第二，它是不是构成了矛盾的运动？也就是说，它是不是从旧的矛盾中生长出来，又内在包含着走向新矛盾的必然性？

历史不做道德法庭。民族斗争压倒阶级斗争的那个时代，不是因为古代人“愚昧”；阶级斗争直接登场的工业时代，也不是因为那时的人“觉悟高”；今天身份政治的兴起，更不是因为当代人“堕落了”。引力机制的每一次迁移，都是被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被人们可支配的时间与精力、被生存条件的紧迫性所客观地决定的。它有它的必然性，因而也有它的进步性。我们要做的，是去理解这种必然性，而不是去审判它。

带着这把尺子,让我们先回到那个最古老的阶段——民族的引力是如何成为地火的第一个火山口的。

第四节 一个辅助性的变量

在继续展开历史之前,我们必须先停下来,把本书提出的这个“引力机制”变量,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地图上,安放清楚。因为如果这一点不讲明白,后面的全部叙述都可能被误解为一种离经叛道的标新立异。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以生产方式为核心标准。从原始公社,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条分期的红线,是由生产方式、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划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是我们绝不打算动摇、也不打算替换的东西。本书从头到尾,都站在这个地基之上。

那么,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个“联结的引力机制”,又是什么?

它不是要取代生产方式这个核心变量,而是要在这个核心变量的基础之上,补充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维度。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生产方式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根本面貌,决定了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出卖劳动力,决定了那个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对立。但是,同一个生产方式——比如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却可以大不相同。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表现为工厂门口的工资斗争与街垒;今天的资本主义,却表现为身份政治、文化斗争、各种围绕着个体特性展开的运动。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它仍然是资本雇佣劳动、仍然是剩余价值的榨取——但是,人们联结和斗争的形式,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此有一个总的回答——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阶级意识的发展程度,阶级结构的具体形态。这些回答都是对的,但它们往往停留在笼统的层面。本书想做的,是从这些笼统的回答里,提炼出一个更具体的分析工具:联结的引力机制。

我们的意思是说,在生产方式这个地基之上,在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之上,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人们究竟是被什么“吸引”到一起的,究竟把什么东西体验为“我们”。这个维度,被两个相互纠缠的因素所决定:一个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它决定了人们有多少余裕去超出最直接的肉体生存;另一个是人们可支配的时间、精力与联结手段,它决定了人们能在多大的范围、以多深的方式彼此组织起来。

这个维度,不取代生产方式的分析,甚至这一维度也仍然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它解释的是:为什么在同一个生产关系之下,斗争的面孔会如此不同。它是一个辅助性的、但却不可缺少的变量。没有这个变量,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的统治方式变了,为什么工人的斗争方式变了,为什么那些在一百年前看起来是“非政治”、“非阶级”的东西,今天却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要战场。

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点,以免一种常见的误解。说引力机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维度,绝不是说它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脱离阶级关系而自行其是。不是的。引力机制的每一次迁移,归根到底,都是被物质生产的发展、被人们生存条件的变化所客观地推动的。民族的引力之所以在古代压倒阶级,是因为匮乏;阶级的引力之所以在工业时代直接登场,是因为工厂把人集中了起来、因为生产力的相对发展给了工人余裕;爱好与个体特性的引力之所以在今天兴起,是因为更高的生产力把一部分人从温饱中解放了出来。引力机制在“表象”上可以千变万化,但它的每一次变化,都深深地受制于那个由生产方式所划定的地基。

这就是我们与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区别。他们把各种“身份”、

各种“话语”当成了独立的、平权的起点；而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引力形式，都是被那个地基所最终校正的枝叶。我们研究枝叶的形态变化，不是为了赞美枝叶，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那棵树。

带着这把尺子，让我们先回到那个最古老的阶段——民族的引力是如何成为地火的第一个火山口的。

第二章 民族的引力

第一节 为什么火山口在民族那里

让我们站在一个农民的视角，去打量农业—封建社会。

这个农民叫什么名字，住在哪片土地上，其实无关紧要。因为从地中海畔的庄园到黄河边的村落，从玛雅的台田到爪哇的梯田，这个身份的处境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天不亮就得下到地里，盯着日头计算还剩多少活要干。他一年的收成，一大半要以地租、贡赋、劳役的形式，交到领主、地主或国家手里。他吃不饱——不是偶尔吃不饱，而是常年地、结构性地、十口之家常有八九口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场旱灾、一次蝗灾、一队过境的乱兵，就足以让整村整村的人饿死。他的寿命短得可怜，他的孩子夭折得惊人，他一辈子见过的人，大概不超出方圆三十里。

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问他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去反对那个收走我们一大半收成的人？

答案会让一切后知后觉的革命者感到沮丧。不是他不想，而是他做不到。他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精力，更没有那个余裕。

这就是理解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总钥匙：匮乏的物质生产，不仅生产出了匮乏的生活资料，更生产出了匮乏的、被生存本身完全占满的人。

我们必须把这一点想透。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是一笔刚性的、不能透支太多的预算。在物质生产极度低下的条件下，这笔预算的几乎全部，都被两件事吃掉了：一是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进行的繁重劳动，二是为了恢复劳动能力而不得不进行的睡眠与进食。他从黎明到黄昏都在土地上，他从黄昏到黎明都在恢复第二天劳动所需的体力。他没有余下的时间去读书，去了解千里之外另一个村庄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没有余下的精力去思考“我和他为什么同是被剥削者”这样抽象的问题；更没有余裕去长途跋涉、去和陌生人结成组织、去筹划一场需要持久坚持的斗争。他的全部存在，被压缩在“今天怎么活过今天”这一个最迫近的问题上。

在这种状态下，阶级意识——那种“天下被剥削者是一家”的、需要抽象、需要视野、需要把无数个具体的苦难在心里拼成一幅共同图景的意识——是根本不可能生长出来的。我们没法要求一个昨天还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今天就要去地主家交租的人，去和一个素未谋面、说着不同方言、住在山那边的农民，建立起阶级的认同。太远了，太抽象了，太不切实际了。他连明天的面包在哪里都不知道。

那么，谁有余裕把斗争当作自己的事业？

答案是：统治阶级。

这是第一个阶段最被人忽略、却最关键的事实。在农业—封建社会，真正有时间、有精力、有资源把“斗争”——战争、掠夺、政治博弈、宗教战争、王朝扩张——当作一项专门事业来从事的，不是被压迫的群众，而是压迫者自己。因为只有他们，从生存的紧迫性中被解放了出来。他们不必天天下地，不必为明天的面包发愁；他们占有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因而

占有了大量的自由时间。正是这些自由时间，让他们可以养武士、可以豢养谋士、可以组织军队、可以策划那些足以改变地图的大事件。

于是斗争的发起者，在这个阶段，是统治阶级，而不是人民群众。

而统治阶级要进行的斗争，服务于谁的利益？当然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为什么而战？不是为了抽象的“自由”，不是为了“被剥削者的解放”——他们自己就是剥削者。他们为的是占有更大的领土，掠夺更多的财富，把更多的人口、土地、贡赋纳入自己的掌控。用本书的话说，他们有“占有更大领土和开拓新世界的狂热”。这种狂热，是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剥削所特有的：那时的剩余，主要不是从生产过程中榨取的相对剩余价值，而是通过战争直接掠夺的、通过对土地与人口的直接占有而获得的贡赋。要扩大这种剥削，最直接的方式不是改进生产，而是扩大地盘——去抢隔壁的农场，去灭隔壁的国家，去把隔壁的人民变成自己的奴隶或农奴。⁶

现在，关键的问题来了：当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动斗争时，他们要把人动员起来。军队是要普通人去当的，赋税是要普通人去缴的，战争是要普通人去死的。一个领主不能只带着他自己一个人去打仗。他需要一个引力核心，把千千万万个分散的、被生存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与武士，凝聚成“我们”，让他们愿意为这个事业流血。

什么样的引力核心，最适合完成这个任务？

不可能是阶级。因为阶级的引力，一旦被真正调动起来，矛头是会调转过来指向统治阶级自己的。一个领主如果对农民说“天下被剥削者联合起来”，那他就是在给自己掘墓。阶级的旗帜，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一面危险的旗帜。

而民族的旗帜，安全得多，也有效得多。

第二节 民族为什么比阶级更“好用”

民族是一种怎样的引力机制？它是通过一系列最具体、最感性、最不需要抽象思考的东西，把人们绑在一起的：我们讲同一种语言，我们拜同一群祖先，我们信奉同一个神或同一段历史，我们被同一个国王统治，我们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死。它不需要我们去理解什么是“生产关系”，不需要我们去做那种把分散苦难拼成共同图景的抽象思考。它直接诉诸我们的乡土、我们的血缘、我们的语言、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那些关于“我们”的故事。它把统治阶级的扩张野心，包装成了“保卫我们的家园”“扩大我们文明的荣耀”“讨伐我们共同的敌人”，他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放在了同一共同体中。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民族成了比阶级更有力、更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引力核心。它既能把群众动员起来为统治阶级的扩张卖命，又绝不会把矛头反过来对准统治阶级本身。一箭双雕。

让我们用具体的历史来印证这个判断。

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全部扩张史，就是一部以“罗马人民”的名义进行的、由贵族与奴隶主阶级主导的掠夺史。布匿战争⁷打了一百多年，汉尼拔踏平意大利⁸的时候，罗马的农

⁶ 当然，这类战争本质上仍然属于阶级斗争，只是它并不是我们最熟悉的、19世纪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那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从表面看，战争呈现为一个民族的民众去对抗另一个民族的民众，仿佛冲突的主体是不同族群。但拨开民族冲突的表象就能看到：战争的发起者是统治阶级，驱动战争的根本动机，是掠夺更多土地、人口与财富，扩大自身实施剥削的范围与规模。普通底层民众——奴隶、农奴与普通武士，被统治者动员起来奔赴战场，承担战争里的伤亡、赋税与苦难；而战争带来的全部战利品、新占领的土地、可供压榨的劳动力，最终都归统治阶级占有。也就是说，民族的旗帜在这里只是动员底层民众的工具，这场冲突的核心利益矛盾，依然根植于剥削阶级为扩张剥削而开展的行动，所以它本质上依旧是阶级斗争。

⁷ 布匿战争：罗马与北非迦太基之间先后爆发的三次战争（公元前264—前146年），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故而得名。战争本质是双方争夺地中海霸权，罗马最终获胜，迦太基被毁灭。

民公民应征入伍，在战场上流血；而战争带来的巨大战利品——土地、奴隶、财富——却大量集中到了罗马的贵族与大奴隶主手中。战争的意识形态是“保卫罗马”“扩张共和国”，是民族与文明的叙事；而战争的实际收益，是阶级的。当那些从军团退伍的农民回到意大利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早已被大庄园吞并，他们自己成了城市里无所事事的无产者。为罗马流过血的人，最终被罗马的贵族阶级挤出了土地。

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是同一个逻辑的又一个壮丽样本⁸。从十一世纪末到十三世纪，欧洲的骑士、领主、商人，一波又一波地向东方进军。动员他们的，是宗教的、民族的、文明的宏大叙事——“解放圣地”“讨伐异教徒”。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的演说⁹，把这场掠夺包装成了一场灵魂的救赎。而实际驱动这架战争机器的，是封建领主对新领地的贪婪，是意大利商人对东方贸易航路的觊觎，是骑士阶级对财富与土地的渴望。农民也参加了——“农民十字军”甚至冲在最前面，成群结队地向东方走去，他们虔诚、贫困、相信圣地会恩赐他们面包；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走到耶路撒冷就死在了路上。宏大的民族—宗教叙事之下，是统治阶级的扩张利益在结算。

中国的历史同样如此。商周以降，直至明清，决定王朝兴亡、文明版图的，是华夏与四夷的碰撞，是中原王朝与游牧帝国的战争，是改朝换代之际那些带着“天命”“夷夏”叙事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汉武帝对匈奴的数十年战争，动员了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海内虚耗，户口减半”¹¹；而战争开辟的疆土、掠夺的财富、确立的帝国秩序，服务于那个大一统的统治阶级。在地表上，我们看到的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雄浑的民族—王朝叙事；在地底下，是赋税、徭役、土地与人口占有的阶级关系在持续地运转。

我们说这个阶段民族的引力压倒阶级的引力，就是在这个宏观的、历史地表的意义上说的。那些改写文明史的大事件，那些决定帝国兴衰的大场面，那些消耗了最多生命、最多财富、最多历史篇幅的斗争，都是以民族—王朝—宗教的形式展开的。阶级的地火在流，但喷出地表的火山口，是民族。

第三节 被压在下面的地火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误以为这个阶段没有阶级斗争的外显。

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地火从未熄灭。不管是之前的民族王朝、宗教叙事的斗争，还是说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的斗争，他们的核心和底层逻辑都是阶级斗争。但即使在这一前提之下，我们也绝不否认，在历史的这个阶段下，阶级斗争仍然部分地局部地外现出来。

地火从未熄灭，面孔亦绝非单一。就在罗马共和国对外扩张的同时，斯巴达克带领角斗士和奴隶在维苏威火山上升起了起义的旗帜，这支队伍一度发展到十几万人，纵横意大利半岛，让罗马的奴隶主阶级在恐惧中发抖了两年多。这不是表现为民族斗争的阶级斗争，这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的直接外显——是奴隶对奴隶主的战争。就在中国的王朝在“夷夏”的叙事中轮番更替的间隙，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喊出了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巾起义的农民头裹黄巾，动摇了大汉的根基；唐末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一次又一次地把那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地主阶级统治撕开大口子。在欧洲，从罗马晚期的巴高达运动¹²，到中世纪

⁸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本土，在意大利半岛转战十余年，多次重创罗马军队，是古代著名的远距离军事远征。

⁹ 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间，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发起的多轮对地中海东岸的军事远征。以夺回耶路撒冷为宗教口号，本质带有掠夺土地与财富的扩张目的，参战者衣饰缝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

¹⁰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芒会议发表演说，以解放圣地、赦免罪行为口号动员西欧各阶层参与东征，表面是宗教号召，实则为封建主对外掠夺扩张提供意识形态动员。

¹¹ 出自《汉书·昭帝纪》，记录汉武帝连年征伐之后，国家财力耗损、户籍人口锐减的状况。

¹² 巴高达运动：罗马帝国时期高卢地区底层民众的反抗运动，“巴高达”在高卢语意为战士。破产农民、隶农

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再到那些披着“异端”外衣、实际上反对教会与封建领主统治的民众运动——法国的扎克雷起义¹³、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¹⁴、捷克的胡斯战争¹⁵——阶级的反抗从未真正停止过。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必须解释的表面矛盾：既然阶级斗争一直存在，为什么我们还要说在这个阶段民族的引力压倒阶级的引力？

答案在于“压倒”二字。

阶级斗争在这个阶段是存在的，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局限。

第一，它是分散的、局部的、难以持久的。一个村庄的农民抗租，一个庄园的奴隶暴动，他们可以愤怒，可以揭竿而起，但他们几乎不可能把这种反抗扩大成一场真正动摇整个阶级统治秩序的、时代性的、持久的阶级运动。为什么？还是因为那个总钥匙——匮乏的物质生产没有给他们提供联结的条件。他们被束缚在各自的土地上，被隔绝在各自的村庄里，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信息传播的手段，没有剩余时间去组织一个跨地区的、持久的阶级组织。一个大泽乡的起义，可以像野火一样烧起来，但它要么被扑灭，要么在胜利后被新的统治阶级收编——因为它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被压迫者自己的、可以重建社会的阶级纲领。它推翻了旧王朝，但它建立起来的，还是一个新的地主阶级王朝。地火喷了一下，但没有烧掉那个让它得以产生的地基。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些阶级斗争在宏观历史的地表上，往往被民族—王朝的叙事所吸收、所覆盖、所转化。一个农民起义军，要壮大自己，往往也得打出一面“天命”的、“吊民伐罪”的、甚至是某一个皇族后裔的旗帜；一次奴隶起义，往往也得裹挟进大量的流民、饥民、不同部族的人，其组织形式也常常退回到军事首领—追随者的古老结构里。阶级的内核，被包裹在各种前阶级的外衣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面：真正有能力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有资源把斗争持久化、有条件把场面做大的，仍然是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所从事的斗争，天然地服务于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并天然地选择民族—王朝—宗教作为自己的引力外衣。人民群众的阶级反抗虽然不绝如缕，但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匮乏，它要么是局部的、短暂的，要么是被统治阶级的宏大叙事所收编的。宏观地看，历史的舞台中央，站着的是带着民族面具的统治阶级。

这就是第一个历史阶段的全貌。它不是“没有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作为地火被压在了民族的火山口之下；它不是“人民群众不觉悟”，而是匮乏的物质生产没有给他们提供登上舞台中央的物质条件。

第四节 草原与农田之间的宏大戏剧

如果要在人类全部古代史中，找一个最能说明“民族的引力压倒阶级的引力”的舞台，那就是欧亚大陆上，草原游牧世界与农耕定居世界之间，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冲突。

这是一幅无比壮阔的图景。从中国的万里长城，到欧洲的多瑙河防线，农耕世界在漫长

与逃亡奴隶多次起兵，冲击罗马贵族与大庄园统治，沉重打击罗马在西部行省的统治根基。

¹³ 扎克雷起义：1358年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爆发于法国北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扎克雷”是封建贵族对农民的蔑称。战争带来的沉重赋税与压迫，驱使农民在吉约姆·卡尔领导下反抗封建领主，打击贵族庄园与封建特权，后遭英法封建势力联合镇压，是中世纪西欧重要的底层阶级反抗运动。

¹⁴ 瓦特·泰勒起义：1381年英国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因领袖瓦特·泰勒得名。百年战争的人头税压榨、黑死病后领主限制劳工报酬，激起底层民众反抗。起义军一度攻入伦敦，要求废除农奴制；谈判时瓦特·泰勒遭刺杀，起义被镇压，沉重冲击英国封建农奴秩序。

¹⁵ 胡斯战争：1419—1434年发生于捷克的反封建、反教会武装斗争，以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的思想为旗帜。底层农民、市民与部分贵族联合起兵，反抗罗马教廷与德意志封建主的压迫，多次挫败教皇组织的十字军讨伐，最终因内部分裂失败，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在捷克的统治。

的历史中，始终面对着来自草原的压力。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马扎尔人、阿拉伯人——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游牧与半游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地冲击着农耕帝国的边疆，有时候被击退，有时候突破进来，征服、建立王朝、最终又被农耕文明所同化。

在这出宏大戏剧里，我们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时代的全部逻辑。

首先，这场冲突的主导者，始终是统治阶级。无论是草原上的单于、可汗，还是农耕帝国里的皇帝、贵族，他们才是这场大戏的真正主角。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大规模西征或南下，背后都不是某个普通牧民的愿望——而是那个部落贵族集团，为了掠夺财富、为了争夺牧场、为了获取农耕世界的贡赋而发动的扩张战争。农耕帝国的每一次北伐、每一次修筑长城、每一次和亲与反攻，背后也都是那个王朝统治阶级，为了保卫它的赋税来源、为了扩大它的统治疆域而进行的军事行动。普通的牧民和农民，是这些战争的提供者——他们当兵、他们纳税、他们死亡——但他们从这些战争中获得了一些什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什么也没有。征服者掠夺来的财富，进了贵族的腰包；战败者承受的苦难，却平均地分摊在每一个底层的头上。

其次，这场冲突，把民族的引力，发挥到了它的极致。面对一个“异族”的敌人，农耕世界内部的阶级矛盾，会暂时地退居幕后。当匈奴骑兵越过长城，当蒙古铁蹄踏破边境，一个农民和一个地主，在这一刻，都成了“我们”——因为面对那个外来的、更可怕的敌人，他们之间的阶级对立，被那个更大的、更直接的生存威胁暂时地压下去了。“驱逐鞑虏”“保卫家乡”——这些口号，把地主和农民暂时地团结在了同一面旗帜之下。统治阶级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操弄这种民族对立，正是因为它能最有效地、最安全地，把被统治者的注意力，从内部的阶级矛盾，引向外部的民族敌人。

这就是古代阶级斗争被“压”在民族形式之下的最典型机制。人民群众当然在这些战争中流血、牺牲、冲锋陷阵，但是，他们是在为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事业而流血。他们保卫的那个“国家”，那个“文明”，本质上是一个由统治阶级所掌控、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机器。他们保卫了这个机器，最终保卫的，还是那个骑在自己头上的阶级。

我们不是说，面对一个外来的、野蛮的征服者，被征服的人民不应当保卫自己的家园。那是真实的生存斗争，有它不容否认的正当性。我们只是指出：在古代的条件下，这种保卫家园的斗争，这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客观上总是由统治阶级来主导、来利用的；它总是在宏观上压倒了人民群众针对自己内部统治者的阶级斗争。地火，在草原与农田的碰撞面前，暂时地熄灭在了地表之下。

这种局面，要等到生产方式发生根本的变革，等到那个把工人集中到工厂里的资本主义兴起，才会被打破。

第五节 为什么奴隶和农民不能把斗争做成大事业

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一个问题。既然阶级斗争从未断绝，既然奴隶和农民的反抗此起彼伏，那么，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像后来的工人那样，把这种反抗发展成一场持久的、时代性的、真正动摇阶级统治秩序的运动？为什么把斗争做成大事业的，始终是统治阶级自己？

答案还是要回到那个物质条件上去。

一个斯巴达克可以聚集起十万奴隶，但他无法把这支军队，转化成能够在整个罗马世界重建社会的政治力量。他的队伍里，汇集了奴隶、角斗士、破产的农民、逃亡的流民，这些人有共同的苦难，却没有共同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他们可以为了自由而拼死作战，却没有一个关于“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的清晰纲领。他们最终的出路，要么是像斯巴达克那样在战斗中被消灭，要么是像历史上无数次农民战争那样，在推翻旧王朝之后，自己被新的统治阶级所收编——刘邦是一个例子，朱元璋是更彻底的例子。他们打碎了一个旧的地主政权，却建立起一个新的地主政权。地火喷了一下，但那个让它产生的地基——少

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多数人被迫劳动——纹丝未动。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要把一场反抗，从“报仇雪恨”提升为“改造社会”，需要一系列物质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农业时代一概不具备。

它需要联结的手段。奴隶被分散在无数个彼此隔绝的庄园里，农民被束缚在各自的土地上，他们没有火车，没有报纸，没有任何可以把千里之外的同类瞬间动员起来的手段。一场起义可以像野火一样在邻近的几个郡蔓延，但它很难在整个帝国的范围内，同时地、有计划地发动起来。

它需要组织的余裕。奴隶和农民，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而耗尽全部精力。他们没有时间去开会、去辩论、去制定纲领、去训练干部。一个人要成为职业的反抗者，他首先得有不劳而获的余裕——而这种余裕，在农业时代，只有剥削者才享有。于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历史上那些真正把反抗组织起来、领导起来的人——无论是陈胜吴广旁边的贵族后裔项梁，还是太平道的张角，还是基督教早期的某些传道者——往往都或多或少地来自那个有一点余裕、有一点文化、有一点组织能力的阶层。纯粹的奴隶和农民，可以是起义的汪洋大海，但这个大海需要一个浪头把它们聚拢起来，而那个聚拢的浪头，常常不能从大海内部自然地生长出来。

它还需要一个关于“平等”的真实的社会可能性。奴隶反抗主人，可以是为了挣脱锁链，可以是为了回到自己的家乡，但他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的社会。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生产力水平上，少数人不劳动而生存，是以多数人劳动为前提的；如果大家都不做奴隶，那谁来养活那个庞大的统治阶层、谁来修建那些宏伟的工程？平等，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于是奴隶的反抗，最多只能做到“我自己不再是奴隶”，而做不到“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奴隶”。他挣脱了自己的锁链，却没有能力砸碎锁链本身。

这就是古代阶级斗争的宿命。它是真实的，它是英勇的，它一次次地动摇着帝国的根基；但它始终无法把自己提升为一个自觉的、改造整个社会的阶级运动。它被压在民族—王朝—宗教的宏大叙事之下，成了那个时代地表景观之下的暗流。

而那个时代地表上的宏大叙事——宗教战争、王朝更迭、文明碰撞——又总是由统治阶级来导演的。他们有时间，有余裕，有组织能力，有把自己的扩张野心包装成“神圣事业”的意识形态机器。在欧洲，是教会的十字军；在中东，是哈里发的扩张；在中国，是“奉天承运”的天命转移。

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不意味着古代的人民群众是被动的、愚昧的。他们在这些宏大叙事中，既是炮灰，也是真正的执行者。没有千千万万农民拿起锄头、跨上战马，任何王朝都打不了仗。但是，决定为什么而战、打完之后谁来坐天下的，从来不是他们。历史的金汤勺，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有余裕的统治阶级手里。

第六节 古代“民族”的真实质地

这里必须做一个重要的澄清，否则我们后面讨论当代的民族问题时就会混淆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农业—封建社会的“民族”引力，它的真实质地，和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民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在古代，无论是罗马的“罗马人民”，还是中原王朝的“华夏”，其认同的核心，更多是王朝的、领主的、宗教的、乡土的。它是一种相对松散的、由上层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投射下来的认同。一个农民，他首先知道自己是某个村、某个姓、某个教区、某个领主的人；他对“罗马”“华夏”这种大认同的感知，是间接的——通过税收、通过征兵、通过官吏、通过他从小听到的故事。他不会因为自己是“罗马人”就觉得自己和罗马的贵族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恰

恰相反，他非常清楚自己和贵族之间隔着一道天堑。这种“民族”，更像是一个罩在无数地方性共同体之上的、由统治阶级操纵的、用来凝聚军队与赋税的外壳。它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的、具身的共同生活——共同的祭祀、共同的领主、共同的乡土、共同的语言习俗。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当代那个重新抬头的“国家层面的民族”，在机制上已经和这种古代形态有了本质的区别。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外壳，而是通过一整套现代的、精密的装置——现代国家机器、国民教育体系、大众传媒、标准化的语言与历史叙事——被系统地、持续地、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生产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先在这里埋下伏笔，等到分析当代时再把它回收。

现在，让我们告别这个漫长的、地火被压在民族面具之下的时代。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将把火山口从民族那里，挪到阶级自己身上。

第三章 阶级的引力

第一节 蒸汽机把人集中到了一起

十八世纪下半叶，一台机器改变了人类联结的方式。

蒸汽机不是凭空出现的奇迹。它是几百年商业发展、城市兴起、手工工场积累的结果。但它一旦出现，就把从前那种分散的、彼此隔绝的、被土地束缚的人，像磁石一样，猛地吸到了一起。

这就是工业革命最深远的后果——它不仅是生产工具的革新，更是人的生存方式与联结方式的革命。

在农业时代，大量的生产者——农民——是被分散在无数个彼此隔绝的小块土地上的。一个村庄与另一个村庄之间，隔着田埂、隔着山岭、隔着方言、隔着几乎一辈子也不会发生一次的往来。这种分散，是阶级意识难以生长的最坚硬的土壤。而工厂，第一次把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人，塞进了同一个巨大的建筑，塞进了同一条流水线上，塞进了同一种由机器节拍所规定的生活里。他们在同一个时间起床，在同一个时间上工，在同一个时间下班；他们呼吸着同样被煤烟熏黑的空气，忍受着同样的工头的呵斥，领取着同样微薄的工资。他们的孩子在同样的破烂棚屋里生病，他们的妻子在同样的饥饿与疲惫中操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中准确地描述了这个过程：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¹⁶

注意这里那个关键的区分：“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大工业首先在客观上，把千千万万处境相同的人，造成了一个在生产关系中占据同样位置的群体——他们都是雇佣劳动者，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活命。这个客观的共同处境，就是阶级。但从客观的共同处境，到主观上意识到“我们是一个阶级”、进而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中间还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在工业时代，第一次被物质生产的发展彻底地架了起来。

为什么是工业时代才架起了这座桥？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总钥匙：时间、精力与余裕。

我们必须极其小心地表述这个问题，因为一个常见的误解会立刻冒出来——有人会说，

¹⁶ 马克思，1847，《哲学的贫困》

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比农民更惨啊！他们在矿井里、在纺织厂里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们的孩子五岁就下了工厂，他们的平均寿命短得可怜，他们住在肮脏、拥挤、瘟疫横行的贫民窟里。相比起来，一个自耕农虽然穷困，但好歹还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凭什么说工人阶级获得了进行阶级斗争的“余裕”？

我们的回答是：这里说的改善，从头到尾都是“相对”的，而绝不是“绝对”的。

工业资本主义并没有把工人养肥。恰恰相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整整一卷的篇幅所揭示的，它把工人的生存条件压缩到了动物般的水平，它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卷入了资本的剥削范围，它用机器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¹⁷。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我们一个字也不会否认。

但是，与农业时代那个“十口九饿八死”的极端匮乏相比，工人的处境仍然发生了一个虽然微小、却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变化：他不再被随时可能降临的、绝对的饥饿所完全吞噬。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不是资本发了善心，而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社会总产品的供给，第一次能够在一个更低的、但却更稳定的水平上，维持起一个庞大的雇佣劳动者阶级的生存。农业时代的农民，他的生存是悬于一线的——一场灾荒就是灭顶之灾；而工业时代的工人，虽然赤贫，但他每天都能拿到一份工资，虽然这份工资微薄，却让整个阶级得以在一个连续的、不被饿死的水平上活着。他们仍然贫穷，仍然痛苦，仍然在死亡线上挣扎；但他们至少有了一种可以预期的、每日重复的生存节奏，而不是那种完全朝不保夕、完全被自然的任意性所支配的绝望。

正是这个微小的、“相对”的变化，释放出了一点点东西——一点点剩余的时间、精力与注意力。

请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在农业时代，一个人的全部生命能量都被“活下去”这一个问题吸干了；而在工业时代，这一点点被释放出来的能量，第一次有了一个新的指向：要求活得更好一点。

这就是那个“对更好一点物质生活的狂热”。工人并不满足于仅仅不被饿死或者更严谨地说，为了满足自己仅仅不被饿死的需求，他要求缩短工作日，要求提高工资，要求让自己的孩子不要五岁就下工厂，要求让自己的妻子不要在矿井里拖着煤车爬行。这些要求，不再是关于“今天怎么活过今天”的，而是关于“明天能不能活得好一点”的。它们是利益的诉求——非常直接、非常具体、非常切身的利益诉求。

而这些利益诉求，第一次有了被组织起来的物质条件。工厂把工人集中在一起，城市把他们聚集在同一个街区，铁路和印刷术让消息可以在几天之内传遍一个国家，早期的工会、工人互助社、工人报刊开始出现。更重要的是，工人的劳动本身——在工厂里协同劳动的经验——训练了他们组织与团结的能力。他们在生产中学会了协作，学会了讨论，学会了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统一行动。

于是，历史的聚光灯，第一次发生了转移。

第二节 斗争组织者的转移

在农业—封建社会，真正有能力把斗争做成大事业的，是统治阶级。人民群众组织的反抗是地火，是零碎的、被压在下方的。而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这个位置颠倒过来了。

现在，最需要斗争、也最有条件斗争的，是被压迫者自己——是无产阶级，是广大的雇佣劳动者。

这一转移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从前，历史的聚光灯总是只打在带着民族面具的

¹⁷ 马克思，1867，《资本论》

统治阶级身上；而现在，舞台中央第一次出现了被压迫者自己的身影，那些舞台上真正的主角，终于站在了聚光灯下，终于从舞台的核心组成走向了舞台的前沿。他们不再是统治阶级战争中的炮灰，不再是王朝更迭时被裹挟的流民，而是自觉地、为了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的斗争主人。

而这个主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的诉求是什么？

非常直接：是利益。

工作日太长，要求缩短；工资太低，要求提高；劳动条件太恶劣，要求改善；失业了，要求救济。所有这些诉求，都不需要复杂的抽象，都不需要高远的理想，它们就是从每天的切身体验中直接生长出来的。一个工人不需要读《资本论》，就能感受到十二个小时的站立是多么难熬；不需要懂剩余价值理论，就知道资本家拿走了他劳动成果中的一大块。他的愤怒，是具体的；他的要求，是具体的；他的敌人，也是具体的——就是那个站在车间里监工的工头，那个坐在办公室里算他工资的老板。

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这种切身的、物质的利益时，那么，把他们凝聚起来的那个最有力、最直接的引力核心，是什么？

只能是阶级。

因为他们共同的处境，就是作为雇佣劳动者被资本剥削；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他们共同的利益，就是在资本的统治下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阶级”这两个字，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如此不加掩饰地，成为了把千千万万工人凝聚成一个“我们”的引力核心。它不需要借助民族的外衣，不需要借助宗教的烟雾，不需要借助领主的威望——因为工人在工厂里日复一日的共同劳动，已经把他们铸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处境、共同利益、共同敌人的整体。

这就是阶级斗争“复归本位”的含义。

地火不再需要借民族的火山口喷发了。它自己，就是火山口本身。

在进入那些具体的历史场景之前，我们必须再补充几个常常被忽略、却真正决定了这个时代面貌的物质因素。因为阶级的引力之所以能在这个时代如此强大，绝不仅仅是因为工人“更穷了”或者“更有觉悟了”，而是因为一整套全新的联结手段，第一次被发明了出来。

第一样东西，是铁路。

在农业时代，一个农民一辈子能活动的范围，大概不超过他靠双脚步行所能到达的距离。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要靠人嘴；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要靠马车，走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要组织一个跨地区的、全国性的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协调两个相距五百公里、彼此几个月都不通音讯的城市的罢工？

铁路改变了这一切。人可以在一天之内，从前需要走几个星期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和铁路一起到来的，是现代的邮政与电报。一封信、一份报纸、一则消息，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传遍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中心。一个发生在曼彻斯特的罢工，可以在几天之内，就为整个英国的工人所知。这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联结速度。阶级——这个本来需要把无数分散的苦难在心里拼成一幅共同图景的抽象东西——第一次有了一个物质的载体，把它从一种“观念”，变成了一种可以被瞬间传递、瞬间共享的社会经验。

第二样东西，是印刷术的普及与工人报刊的出现。

在农业时代，识字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他接受信息的渠道，是口耳相传，是村里的说书人，是教堂里的布道。他无法自己去阅读、去思考、去比较那些关于自己处境的论述。而工业资本主义，为了运转它那套复杂的机器，为了让工人能够看懂图纸、读懂规章、理解数字，不得不第一次大规模地普及了识字教育。

工人一旦识了字，印刷品就成了他们最锐利的武器。工人报刊在贫民窟里秘密地流传，把一个工厂里的苦难，讲给全国的工人听；把一个地方的斗争经验，传授给另一个地方的同

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¹⁸，马克思的《资本论》¹⁹，以及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工人报纸——这些印刷品，第一次把成千上万分散的、孤立的工人，通过文字，联结成了一个“我们”。一个在伦敦贫民窟里读着《工人辩护士报》²⁰的裁缝，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巴黎、在柏林、在维也纳的素未谋面的兄弟，过着和自己一样的生活。这种“原来我们是一样的”的意识，就是阶级意识。而它，是被印刷机批量地生产出来的。

第三样东西，是工厂纪律本身对工人的训练。

这一点尤其具有辩证的意味。资本把工人集中在工厂里，本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他们——用分工碾碎他们的完整性，用机器的节拍规训他们的身体，用工头的监视压服他们的反抗。但是，同一个工厂，也在无意中，把工人训练成了一个可以团结起来的集体。成百上千的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按照同一个节奏，协同地劳动——这种日常的、朝夕相处的共同生活，这种共同忍受工头呵斥的经验，这种共同在发工资那天算账的体验，自然而然地，就在工人中间培育出了一种团结的感情、一种互助的习惯、一种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行动的能力。

资本需要一支训练有素、守纪律、能够协同劳动的工人队伍。但是，当这支队伍被训练得能够协同劳动的时候，它也就同时被训练得能够协同罢工、协同抗议、协同斗争了。资本家为了提高效率而强加给工人的那种纪律，最终在工人手里，转变成了组织自己的力量。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资本锻造了一个它再也无法完全控制的对手。

正是这三样东西——铁路与电报所提供的联结速度、印刷品所提供的共享意识、工厂纪律所提供的组织能力——与那个“相对改善”的生存条件结合在一起，才使工人第一次有能力，把他们分散的愤怒，组织成一场自觉的、持久的、总体性的阶级运动。

让我们用几个历史场景，来为这个时代画一幅像。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是这个新时代的第一个分娩地。宪章运动²¹是第一次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性质的无产阶级运动。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在《人民宪章》的签名书上按下自己的手印，要求普选权，要求政治权利。他们不是被哪个领主动员起来的，他们是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报刊在贫民窟里流传，工人的集会在广场上举行，工人的工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恩格斯当时住在曼彻斯特，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是第一本关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历史主体的调查报告²²。

一八四八年，革命像野火一样烧遍欧洲。从巴黎到柏林，从维也纳到米兰，街垒在街头筑起，工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也正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为这个正在觉醒的阶级，写下了它的纲领²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之所以在这个时代振聋发聩，不是因为它动听，而是因为它说出了这个时代已经在物质上成熟了的趋势：工人在工厂里的共同处境，已经把他们推向了联合。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这种联合的一次壮丽而悲壮的实验²⁴。巴黎的工人，在普鲁士军队兵临城下、资产阶级政府怯懦投降的时刻，自己拿起了武器，自己管理了城市，自己运转了社会七十多天。他们试图把国家机器掌握在自己手里，试图让那些一直站在他们对面

¹⁸ 恩格斯，1845，《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¹⁹ 马克思，1867，《资本论》

²⁰ 《工人辩护士报》：由约·贝·莱诺创办，1865—1866年在伦敦发行，是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机关周报。报纸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宗旨，刊载各国工人运动报道，马克思担任该报所属股份公司理事会理事，参与办报事务，传播第一国际的主张。

²¹ 宪章运动：1836—1848年发生在英国的工人政治运动，因工人提出《人民宪章》而得名。工人们以普选权等政治诉求为核心，通过集会、请愿等方式斗争，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²² 恩格斯，1845，《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²³ 马克思，1848，《共产党宣言》

²⁴ 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建立的革命政权。普法战争后，巴黎工人奋起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公社，尝试打碎旧国家机器，实行一系列维护劳动者利益的措施。公社仅存在72天便遭到镇压，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的权力，第一次为他们服务。公社最终失败了，凡尔赛的枪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公社社员；但它作为工人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永远地铭刻在了阶级斗争的史册上。

然后是第二国际的几十年，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蓬勃发展，是八小时工作日的争取，是工厂立法的推进，是童工的逐步禁止，是工人阶级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两条战线上的节节胜利。在这个时代，阶级几乎不需要被“建构”——它就明明白白地写在工人每天的生活里。一个英国的纺织工人，一个德国的采煤工人，一个法国的铁路工人，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他们知道，自己和遥远国度里那些和自己一样出卖劳动力的人，有着共同的处境与共同的敌人。《国际歌》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诞生、并唱遍全世界的。

这就是阶级的引力最充沛、最直接、最不加掩饰的时代。

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提前埋下一个伏笔，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后面如何理解二十世纪的复杂转折。

阶级的引力在这个时代如此充沛，并不意味着民族的引力从此就烟消云散了。恰恰相反。

我们已经说过，民族的引力，在农业时代是统治阶级用来动员群众、又不会把矛头对准自己的安全外衣。当工人阶级开始以阶级的姿态登上舞台时，各国的统治阶级立刻发现，这件旧外衣仍然好用，甚至在新的条件下变得更好用了。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曾经庄严地承诺，各国工人将用总罢工来阻止本国统治阶级发动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当战争真的来临时，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都投票支持了本国的战争拨款；各国的工人，隔着战壕，互相射击。那些昨天还在唱《国际歌》、还在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人，今天穿上军装，为了“祖国”“民族”“文明”而杀死同样是工人的敌人。

这个历史事件，后来被称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它为什么破产？原因可以写很厚的书。但从本书的视角看，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阶级的引力虽然充沛，却从来不是唯一的引力。民族的引力从来没有真正退场过；一旦统治阶级能够把民族的叙事重新激活、重新与工人的情感与利益绑定，它就完全有能力与阶级的引力一较高下，甚至在关键时刻把工人重新拉回到民族的旗帜之下。

这个伏笔，我们先放在这里。因为它将在我们分析当代时，以一种全新的、更加深刻的方式，重新浮现出来——那就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在数字时代的重新抬头。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十九世纪的街头，收回我们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在这里，阶级的引力，似乎神秘地退潮了。

第四章 原子化与新联结

第一节 阶级叙事为什么沉寂了

现在，我们站在自己的时代面前。

这个时代最醒目的表面事实，就是阶级叙事的沉寂。我们说它“被唱衰”，一点都不夸张。打开任何一本主流的社会评论，我们会发现人们早已习惯了用别的范畴来描述自己的处境与斗争。工人这个词还在，但它更多是以“打工仔”这样一种自嘲的、戏谑的、去政治化的方式出现；阶级这个词还在，但它要么被埋葬在学院的故纸堆里，要么被简化为几句谁也不当真的套话。取而代之占据公共讨论中心的，是身份、是认同、是文化、是生活方式、是各种各样的“主义”。

面对这种沉寂，人们提出过无数解释，但几乎没有一个真正切中要害。

有人说，这是时代的错误，是一时的风气，是人们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迷惑了，只要

擦亮眼睛，阶级意识就会回归。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它把一个深刻的历史变迁，当成了可以靠“启蒙”来纠正的认知偏差。

有人说，这是人民群众的罪过。说他们安于享乐，说他们贪图安逸，说他们不再敢于斗争，说他们的觉悟下降了。这种说法我们后面要专门批驳，这里先按下不表。

也有人说，阶级斗争过时了。说物质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阶级划分已经不再清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简单对立已经不再适用，宏大叙事已经破产，历史已经终结。这是一种把表象当成本质的说法，它把“阶级叙事的形式”的消退，误读成了“阶级斗争的本质”的死亡。

还有人说，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太强大了。说他们掌握了媒体、掌握了教育、掌握了国家机器，把反抗的路全部堵死了。这种说法看到了力量的对比，却没有看到力量对比本身是如何被物质条件所塑造的，更没有看到今天的斗争并非没有发生，而是换了一种面目在发生。

这些解释有一个共同的盲区：它们都没有认真地去考察，今天的斗争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在进行；它们都没有静下心来问一句，在阶级叙事看似沉寂的地表之下，地火真的熄灭了吗，还是只是换了一个火山口？

本书的答案，前面已经说过了：地火没有熄灭。它仍然是阶级斗争。只是，把人们凝聚起来的那个引力机制，发生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三次迁移。而要理解这次迁移，我们必须先从这个时代一个最基本的、看似矛盾的事实讲起——社会化的要求，与联结方式的原子化。

第二节 一种“原子化”的联结

我们使用“原子化”这个词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它太容易被误解成“隔绝”。

今天的人，真的是彼此隔绝的吗？显然不是。一个城市里的年轻人，他的手机里可能躺着几百个联系人，他在某个网络社群里可能有上千个志同道合的网友，他可以在一瞬间和地球另一端的人就某个话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从这个角度看，他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联结”得更广。

那么，我们凭什么说他是原子化的？

因为原子化描述的，不是“有没有联系”，而是“联系以什么方式存在”。

让我们回想一下前两个时代的联结方式。在农业时代，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和一个具身的、面对面的共同体绑在一起——他的氏族、他的村庄、他的教区、他的领主庄园。这些共同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是直接的、具身的、共享同一个物理空间的。人们在同一个广场上集会，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在同一个教堂里祷告，在同一个节期里欢庆。他们彼此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中介的、远程的，而是身体性的、在场的。一个人离开了这个共同体，几乎就无法生存。

在工业时代，这种具身联结的对象，从村庄换成了工厂与工人社区。成百上千的工人在同一个车间里并肩劳作，在同一个工人街区里比邻而居，在同一个酒馆里讨论当天的斗争。这种联结虽然规模更大、跨越了血缘与乡土，但它仍然是具身的、在场的：我们和我们的工友每天见面，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去过他家，我们和他一起在工厂大门外和工头对峙过。

而今天呢？

今天的联结，从这种具身的、共享物理空间的形式，变成了一种远程的、中介化的、脱离了共同物理空间的形式。人们不再因为住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工厂上班而联结；他们因为在网络上共享同一种爱好、同一种审美、同一种观点而联结。这种联结当然是真实的——两个素未谋面的网友，可以因为共同喜欢一个冷门的乐队而成为莫逆之交，可以因为共同关切某个社会议题而一起发声。但是，它和前两个时代的联结，有一种本质的区别：它不绑定于一个共同的、具身的生活空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子化”的准确含义。它不是说人和人之间没有联系——原子和原子之间，难道就没有以电磁相互作用力为主，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共同作用的三种基本相互作用力吗？当然有。²⁵它说的是，这种联系，从那种直接的、身体在场的、共享一个物质生活世界的紧密共同体，变成了一种远程的、媒介中介的、随时可以断开的、松散得多的联结形式。我们今天的联结，更像是一个个独立的原子，通过电磁场相互作用，而不是像从前那样，被焊接在同一个金属块里。

这里就出现了那个表面上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来没有这样高过——全世界的分工如此细密，一件商品从原料到成品要穿过几十个国家，无数人的劳动被编织进一张密不透风的协作之网；另一方面，人们在日常体验中的联结，却从未这样松散过——他和他的同事之间可能只是点头之交，他住在一个社区里却不知道邻居姓甚名谁，他最亲密的“共同体”可能是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线上群组。

社会化的生产，与原子化的联结，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矛盾之一。而我们后面会看到，正是这个矛盾，将成为新的斗争形式从中生长出来的土壤。

第三节 旧联结的三大支柱的坍塌

为了看清这种变化，让我们把前两个时代联结所依据的基础，做一个简单的盘点。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之所以彼此联结、结成“我们”，主要依靠三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生活住所的空间。我们和我们的氏族、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宗族，因为住在一起而联结。这是最古老的一根支柱，它直接植根于血缘与乡土。一个人属于哪里，首先是由他出生在哪里、世代生活在哪里决定的。

第二根支柱，是工作场所的空间。我们和我们的工友，因为同一间工厂、同一个作坊、同一片工地上班而联结。这根支柱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而上升为最重要的一根。它比血缘更广泛，它把来自不同地方、说着不同方言的人，因为共同的雇佣处境而聚到一起。

第三根支柱，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为区域与民族的共同性。我们和生活在同一片区域、被同一个政权统治、说着同一种语言、共享同一段历史叙事的人，因为这种共同性而联结。这根支柱，是前两个时代中那个宏观的“民族”引力的物质载体。

请注意这三根支柱的共同点：它们都是空间性的。不管是住所、工厂还是区域民族，它们都把“联结”绑定在一个具体的、可触摸的物理范围之内。我们和谁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身体被放置在哪个空间里决定的。

而今天，这三根支柱，一根接一根地松动了。

交通的发达，让人们可以轻易地离开出生地，在千里之外谋生；工作的流动性，让“终身在一个工厂”变成了例外；互联网的普及，让一个人不必和身边的人发生深层联系，也能在遥远的地方找到同好。空间，这个曾经把人牢牢焊在一起的最强大的引力，第一次松开了它的手掌。

但仅仅是空间的松动，还不足以解释今天的新联结。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在同时发生。

要真正看清这种“原子化”，最好的观察对象，就是今天那些最庞大的、最新型的雇佣劳动者——平台上的零工劳动者。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快递员——这些人的数量，在今天的主要国家里，已经成了一个惊人的、甚至可以和传统产业工人相提并论的规模。他们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²⁵ 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力：自然界共存在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分别为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与引力。在原子尺度，引力强度极低，基本可以忽略；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电磁相互作用为主，强、弱相互作用仅在原子核极近距离内生效。文中借用原子模型作为类比，意在说明个体之间依然存在联系，只是不再被固定的实体空间所束缚。

最典型的劳动者。而他们的生存处境，把我们所说的“原子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外卖骑手，他在哪里工作？他在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他不和任何一个同事在一个固定的车间里并肩劳作。他的“同事”——其他的骑手——他一天都碰不到几个。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协作，没有交流，没有那种在工厂里朝夕相处、共同忍受工头、共同商量对策的亲密关系。他们是一个个被算法独立调度的、孤立的节点。

他和谁打交道？和那个看不见的算法。算法决定他这单去哪里、要多久、走哪条路线；算法根据他的准时率、好评率，决定他能不能接到好单；算法在他迟到的时候自动扣钱，在他想要申诉的时候，面对着一个永远转不到人工客服的语音菜单。他不认识那个派单给他的人——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套程序。他甚至不知道，决定他命运的那个算法，究竟是怎么运转的。它是一个彻底的黑箱。

这就是数字时代劳动者的原子化。他们当然在工作——他们比谁都辛苦，在烈日下、在暴雨里、在交通的缝隙里，以命相搏。但是，他们不再像十九世纪的工人那样，被集中在一个可以彼此看见、彼此认识、彼此团结的空间里。他们被分散在整座城市的毛细血管里，被算法一个个地单独调度。他们的共同处境是客观的——所有骑手都被同一个算法压榨——但是，他们在主观上，却很难直接地感受到这种共同处境。因为他们不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矛盾在劳动者身上的直接显现：生产从来没有这样社会化过——全城的订单都在同一个平台上被统一调度；而劳动者之间的联结，从来没有这样原子化过。他们被算法孤立着，彼此竞争着——一个骑手多跑一单，就可能从另一个骑手那里抢走了那单生意。竞争取代了联合，个体在平台的调度下，沦为一个个彼此竞价的原子。

这种原子化，正是资本统治在当代最成功、也最可怕的产物。一个被孤立的骑手，是最容易被支配的——他不知道自己的苦难是结构性的，他以为是自己跑得不够快；他不敢反抗算法，因为申诉无门；他想和别的骑手联合，却发现他们散落在全城，连面都见不到。

但是，请注意——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我们前面说过，原子化并不意味着没有联结。这些骑手，他们在网络上有自己的群。他们会在等餐的间隙，在某个骑手聚集地，互相交流哪条路线容易超时、哪个商家出餐慢、怎么和客服周旋。他们会在网络论坛里，分享自己被算法罚款的经历，控诉那个黑箱。这些联结是松散的、零散的、暂时还没有组织成斗争的——但是，它们存在着。它们是那个“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而一旦那个共同的、切身的危机——比如算法突然大幅压低单价、比如一次惨烈事故——把这些分散的原子瞬间激活，这些松散的线上联结，就会在几天之内，转变成一场有组织的、跨城市的抗争。

今天的一切新联结，都是这样。它既是原子化的，又是联结着的；既是松散脆弱的，又随时可能被某个共同的事件瞬间点燃。它的潜能，和它的局限，就纠缠在这同一个状态里。

那就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把越来越多的人，从“满足温饱”这个最迫近的问题中，相对地解放了出来。

我们又一次要强调“相对”二字。今天世界上仍然有无数人在饥饿线上挣扎，今天的工人仍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以算法为形式的新型剥削——这些我们绝不否认。但是，与农业时代“十口九饿八死”的普遍绝境相比，与工业时代工人在矿井与纺织厂里连轴转的处境相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一个人数庞大的中间阶层、一个受过教育的、不必把全部生命能量都耗在单纯糊口上的人群，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了。

这个人群的出现，释放出了一种新的需要。

当一个人不必把全部时间与精力都用来解决“今天吃什么”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了余裕，去关心那些不是直接围绕着肉体生存的问题：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和这个世界之间，除了买卖与雇佣，还有没有别的关系？

这些需要，我们统称为精神的需要——对爱好的需要，对审美的需要，对自我表达的需

要，对被承认的需要，对一种超越于工资之上的意义的需要。

而这些需要，是无法用那三根旧的空间支柱来满足的。我们住在哪个小区，我们在哪家公司上班，我们属于哪个民族，这些都不能回答“我喜欢什么”“我认同什么”的问题。于是，一种新的联结，应运而生。

这种新的联结，不再绑定于空间，而是绑定于内心。人们因为同一种爱好而联结——一群人因为共同痴迷于某种小众的音乐风格而聚集，因为共同热爱某一种亚文化而相识；人们因为同一种身份认同而联结——女性因为共同面对的性别处境而彼此声援，某个性取向的人因为共同的歧视经验而相互支撑；人们因为同一种价值关切而联结——环保主义者因为共同忧虑这个星球的未来而走到一起。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爱好、以个体特性为核心的新的引力机制。它的圆心，第一次从外部的空间，向内收缩到了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收缩到了他的爱好、他的审美、他的身份、他那些最本真的、最私人的、最“我之为我”的特性之上。

这里，我们要把现代新联结的一个根本特征，点出来——它的自愿性。

在农业时代，我们出生在哪个村庄、属于哪个氏族，这是我们无法选择的。我们一生下来，就被抛进了那个血缘与乡土的共同体里，我们和它是命运攸关的——离开了它，我们几乎无法生存。在工业时代，我们在哪个工厂上班、住在哪个工人社区，表面上是我们“选择”的，但实际上，我们被雇佣关系牢牢地绑在那里；我们和我们的工友联结，首先是因为我们被同一个资本所雇佣，而不是因为我们志趣相投。

旧联结的本质，是强制性。它不是我们选的，是我们的生存处境替我们选的。我们必须和这些人在一起，因为离开他们我们活不下去。

而今天的新联结，恰恰相反。它是自愿的。我们加入一个同好的社群，不是因为我们必须靠他们吃饭，而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们认同某种身份，不是因为我们被某个政权强制要求这样认同，而是因为那种身份说出了我们内心的某种真实的感受。我们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离开。没有人会因为我们退群了，就不给我们饭吃。

这种自愿性，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意味着，人终于可以不再被那种“必须和这些人绑在一起才能活”的生存强制所决定，去选择和谁在一起了。我们和别人联结，不再是因为我们被迫共享一个生存空间，而是因为我们自愿共享一种内心的东西——爱好、审美、身份、价值。

但是，这种自愿性，也带来了它的反面——联结的“轻盈”。

因为是自愿的，因为可以随时离开，所以这种联结，就没有旧联结那种生死与共的沉重。我们和群友吵一架，可以退群；我们对某个圈子厌倦了，可以离开；我们今天为某个议题热血沸腾，明天就可能被别的新鲜事吸引走注意力。这种联结是真实的，但它是松散的、易变的、没有强制力的。它不要求我们为它牺牲，也不承担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和网友可以亲密无间地聊上几年，但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在现实里见过面；我们可以为同一件事愤怒到凌晨，但第二天醒来，我们各自回到自己平庸的生活里。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子化”的另一面。人们当然在联结，但是这种联结是轻的、是可断开的、是没有那种把人焊死在一起的物质强制力的。它像一片片轻盈的云，可以聚集成型，也可以随风散去。

正是这种轻盈，构成了今天斗争的一个根本特点，也是它和十九世纪斗争的一个关键区别。十九世纪的工人，他们的团结是被物质处境强制锻造出来的——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工厂上班，不团结就会被个个击破。而今天的新联结，它的团结没有这种物质的强制力做后盾。人们因为共同的爱好而聚集，但这种聚集能不能转化为持久的、有组织的斗争，能不能在困难面前不散掉，取决于矛盾能不能把它逼到那个份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这种新联结，一方面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被

矛盾推向斗争，就会退化成为一种松散的、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它的轻盈，既是它的自由所在，也是它的脆弱所在。

让我们先把这种新联结的几种典型形态，具体地看一看。

女性主义与女权运动，是这种新引力机制最典型、也最强大的形态之一。一个女性，她之所以加入一场为女性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直接打动她、把她和千千万万其他女性联结起来的那个核心，是什么？在我们的框架看来，是一种以个体特性——作为女性的生存经验、身体经验、被对待的方式——为引力核心的认同。她在地铁上被骚扰的经验，她在职场上被低估的经验，她在家庭中被分配了更多无偿家务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身体性的、切身的、被深深地打上了“她之为她”的印记的。她和另一个从未谋面的女性之间，不需要因为同一间工厂上班、不需要因为同属一个地区，就能瞬间认出彼此——因为她们共享着同一种作为女性的生存处境。这是一种扎根于个体生命经验深处的引力。

我们必须立刻补充：我们说它是“以个体特性为引力”，丝毫不意味着它与阶级无关。恰恰相反，性别压迫有它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女性所遭受的无偿家务劳动、职场歧视、身体客体化，都与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与劳动力的生产机制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个联结人们、动员人们的直接引力核心，它在表面上，首先诉诸的不是“我们是雇佣劳动者”，而是“我们是一个女人”。这就是它与传统阶级斗争在引力形式上的区别。

绿色环保组织，则代表了一种更复杂的形态。它兼有爱好与关切的双重性质。一个人投身环保，可能确实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热爱山川草木，热爱这个星球本来的样子——这是一种近乎审美的、近乎爱好的驱动力。但它同时又超出了纯粹的个人爱好，指向了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生存前景——这又带上了一点超越个体的、近乎利益（只不过是物种意义上的长远利益）的色彩。它处在爱好与直接的具身阶级利益之间的那个中间地带：它已经不像十九世纪的工资斗争那样，直接绑定在我们今天能不能吃饱、这个月能不能交房租上；但它也还没有完全退化成为一种纯粹私人的消遣。它是一种过渡形态，是利益与爱好开始融合的那个中间环节。

至于那些更“纯粹”的新联结——二次元的同好、某种小众文化的爱好者、某种特殊审美取向的社群——它们甚至已经不直接指向任何斗争了。它们就是纯粹因为“我们喜欢同一种东西”而结成的共同体。人们在里面交流、分享、获得认同，获得一种“原来世界上还有和我一样的人”的慰藉。这种慰藉本身，我们后面会论证，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现在，让我们把前面悬置起来的那一朵花，重新捡起来——国家层面的民族。

在第二章里我们说过，在农业—封建社会，民族的引力之所以压倒阶级的引力，是因为物质生产的匮乏，使群众被生存的急迫所吞噬，没有余裕去进行阶级的联合。那个解释，适用于古代。

但是当代国家层面的民族重新抬头，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了。这里发生的，不是匮乏的压迫，而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物极必反”。

让我们把这个逻辑拆开来看。

在工业时代，群众之所以如此紧密地被阶级的引力所凝聚，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仍然非常直接地、非常迫切地由物质利益所决定。他们还没有摆脱生存的紧迫性——他们在工厂里流血流汗，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涨工资、减工时、活下去”这些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所占据。正是这种紧迫性，把他们牢牢地钉在了阶级的旗帜之下。

而到了当代，情况发生了一个看似悖论的转折：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人们开始相对地摆脱了那种赤裸裸的、生存层面的紧迫性。他们不必再每天睁开眼就为下一顿饭发愁。当他们从这种直接的生存迫切中跳出来，向上一跃，来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精神需要的层次——之后，他们对那个核心的、物质利益的引力，反而不像工业时代那样敏感、那样强烈了。

这就是“物极必反”。不是因为贫穷，人们才被民族所凝聚；恰恰是因为物质相对丰裕了，人们才不再把全部注意力聚焦在阶级利益上，才有余裕去关心那些更高的、更抽象的、更关乎认同与意义的东西。而在这些更高的层面上，国家层面的民族叙事，作为一种现成的、强大的、被系统性生产出来的认同形式，趁虚而入。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双重局面：在宏观的国家层面，民族的引力重新抬头，压倒了阶级的叙事；在微观的个体层面，爱好与个体特性的引力蓬勃生长，也压倒了阶级的叙事。一头一尾，两面夹击，阶级的那个直接的、以利益为核心的引力，被夹在了中间，显得沉寂了。

这里，我们必须兑现第二章结尾埋下的那个伏笔，把当代国家层面的民族，与古代的民族，做一个本质的区分。因为如果我们简单地说“当代的民族和封建时代差不多”，那将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也会成为我们整个框架的一个明显漏洞。

古代的“民族”认同，我们说过，是一种松散的、自上而下投射下来的外壳。一个农民对“华夏”或“罗马”的认同，是间接的、模糊的，主要通过赋税、征兵、乡土习俗来传递。他不会真的觉得自己和皇帝是“一家人”。

而当代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通过一整套现代的、精密的、无所不在的装置，被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系统地生产出来的。

这套装置包括：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一个孩子从小学开始，就被灌输一整套关于“我们民族”的起源、苦难、奋斗、光荣的历史叙事；他学习的语言是标准化的民族语言，他唱的歌是民族的歌，他过的节是民族的节。这套教育，不是松散的，而是持续十几年、贯穿一个人整个成长过程的。

它还包括：大众传媒与现代媒体工业。电影、电视、广播、如今的社交媒体，日复一日地把“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把民族的英雄、民族的敌人、民族的荣耀与屈辱，呈现在每一个人面前。一个当代人，每天都在被海量的民族叙事所包围，就像鱼被水包围一样。

它还包括：现代国家机器本身。从护照、国界、关税，到兵役、法律、公共服务，国家通过它的每一项日常运作，不断地把“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这一事实，铭刻进每个人的生活里。

这就是现代民族主义与古代形态的本质区别：古代的民族认同，是统治阶级为了战争与税收而自上而下“投射”的一个外壳；而当代的民族主义，是被现代教育、媒体、国家机器持续地、日常地、深入骨髓地“生产”出来的一种活的认同。它不需要依靠一场战争来激活——它就在每个人的日常经验中，被不断地再生产着。

那么，这种当代民族主义，在我们的框架里处于什么位置？

它仍然是那个宏观层面的引力核心，仍然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时代所披上的一件外衣。它之所以在当代重新抬头，不是因为群众又回到了古代的蒙昧，而是因为——当物质的相对丰裕使人从生存紧迫性中解脱出来，当直接的阶级利益引力被精神需要的上升所暂时稀释，那些现成的、强大的、被系统性生产出来的宏观认同形式，就填补了这个引力的真空。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微观层面的身份政治、爱好联结，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都是阶级叙事退潮之后，引力核心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重新分布。

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那个不变的地基。无论是当代精致的民族主义，还是微观的身份政治，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离开那个由物质生产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阶级地基。它们只是这个地基之上，在不同方向上生长出来的新的枝叶。而这棵树的根，仍然深深地扎在阶级斗争的土壤里。

现在，我们已经把当代的地表景观完整地描画了出来。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切，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它对我们的事业，意味着什么？

第五章 两种指责与一个标准

第一节 两种喧嚣

面对阶级叙事的沉寂，公共空间里回荡着两种喧嚣。

一种是极度悲观的喧嚣。它宣布阶级叙事已经破产，宏大叙事已经破产，共产主义已经破产，历史已经终结。它说，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形态，那个曾经激动了一个世纪的关于一个新社会的理想，不过是一场已经醒过来的梦。这种喧嚣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一度甚嚣尘上，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主流话语中那个不言自明的背景。

另一种喧嚣，则来自我们自己的阵营——来自左翼内部。它不宣布资本主义是终点，但它把矛头调转了方向，指向了人民群众自己。它说，群众的觉悟不够高；说他们贪图享乐，安于现状；说他们不再敢于斗争，不再像前辈那样热血；说他们被消费主义、被娱乐、被各种各样的小众爱好收买了，堕落了。这种喧嚣充满了道德上的义愤，充满了对“过去好时光”的怀念。

这两种喧嚣，方向相反，却共享着一个我们在第一章就已经拆解过的前提：它们都把某一种特定的斗争形态，当成了斗争本身。悲观主义者看到十九世纪那种街头巷战的形态消失了，就宣布斗争本身已经死亡；而愤怒的左翼看到今天的群众没有再像十九世纪那样走上街垒，就宣布群众已经堕落。

本书对第一种喧嚣，基本不予理会。“历史终结论”的浅薄，已经被它自己此后几十年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分化——反复证伪过了。把它当作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对手，反而是抬举了它。我们真正要认真对待的，是第二种喧嚣。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人，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它的错误因而更隐蔽、危害也更大。

在系统地批驳之前，我们必须先把本书的评判标准亮出来。

前面说过，我们的理论体系，从来不问道德上的对错，从来不做道德观上的正误评判。面对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无论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还是今天的身份政治与爱好联结——我们不说它“好”还是“坏”，不先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它指手画脚。我们只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是不是进步的、革命的？它是不是代表了物质生产的更高发展，代表了人的解放的更进一步？它是不是把人从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出了人的新的能力与新的需要？

第二个问题：它是不是构成了矛盾的运动？它是不是从旧的矛盾中必然地生长出来，又内在地包含着走向新矛盾的必然性？它是不是一个过渡的、暂时的、终将被矛盾推向更高阶段的环节？

这两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看问题的方式。历史不是一个道德法庭，它不奖励“高尚”，也不惩罚“堕落”。历史只按照它自己的铁的规律前进：物质生产发展到哪里，人的存在方式、联结方式、斗争方式，就相应地改变到哪里。任何一种现象，只要它是从这种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生长出来的，它就有它的必然性，因而也有它的进步性——哪怕它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混乱的、倒退的、令人失望的。

用这把尺子，我们立刻就能看清那种“指责群众”的喧嚣，错在哪里。

那些愤怒地指责群众“安于享乐”“不再斗争”的同志，他们犯了几个层层递进的错误。

首先，他们犯的是教条化的错误。他们认识不到阶级斗争的根本，误以为十九世纪那种轰轰烈烈的赤色运动——街头的巷战、街垒的构筑、总罢工的烽火、《国际歌》的高唱——就是阶级斗争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他们把这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表现，当成了阶级斗

争本身。于是，凡是不符合这幅旧图画的东西，凡是他们没有见过、没有预料到的斗争形式，就都被他们当作“非斗争”、当作“堕落”、当作“背叛”而加以唾弃。

这是一种多么傲慢的教条！阶级斗争作为地火，它的喷发形式，什么时候、曾经被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人，规定死了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想到两百年后斗争会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形式展开。把一种具体的历史形态凝固为永恒的标准，然后用它来审判一切新的事物，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应该警惕的形而上学。

其次，这种指责是对历史主体的亵渎。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阶级斗争的真正主体。这个主体，从来不会按照任何理论家预先画出的图纸来行动。它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形式、用什么口号、凝聚什么样的引力核心来行动，都是被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生存处境、可支配的时间与精力所客观地决定的。今天的群众没有像十九世纪那样走上街垒，不是因为他们“堕落了”，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已经变了——他们的生存处境、他们的需要、他们被物质生产所释放出来的新的追求，都和一百年前的工人不一样了。

不去客观地分析这些变化，反而站在一个想象出来的道德制高点上，责备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不够觉悟”“不够勇敢”“贪图安逸”——这是把理论自己的无能，转嫁到了历史主体的头上。当一种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它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去修改现实、去责备现实，而应该是去修改自己。可是这些同志做了相反的事情：当现实不符合他们的理论时，他们就宣布现实错了。

最后，这种指责在实践上是完全有害的。它把矛头从真正的敌人那里移开，转而对准了自己人。当一个人把精力都用来责备“群众不争气”的时候，他就没有精力去分析：当代的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新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新的斗争形式中，那些进步的、革命性的萌芽究竟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去凝聚、去把这些萌芽推向它的必然归宿？一句“群众堕落了”，听起来义正词严，实际上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它是知识分子在无力改变现实时，用来安慰自己的一种廉价的优越感。

所以，我们要坚定地今天的群众辩护。他们没有堕落。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生存、在联结、在斗争。而这种新的方式，我们要用上面那把历史的尺子，去客观地衡量它。

第二节 单看联结：这是历史的进步

那就让我们来衡量一下。

面对以爱好、以个体特性为核心的新联结，我们先不急着讨论它的斗争——我们先单看联结这一个方面。我们问：这种联结本身，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本书的回答毫不含糊：这是历史的进步。

不管那些守旧的、传统的左翼同志怎样皱着眉头看待它，不管他们怎样把二次元、把小众爱好、把各种各样的身份认同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我们都要说：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爱好、把自己本真的个体特性释放出来，并以此为圆心去和别人联结、去交友、去获得认同——这本身，就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真实的步骤。

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得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的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们为之奋斗的全部目标，归根结底，是自由劳动，是人类解放。关于人的“类本质”，我们打算给出什么先验的定义，不打算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从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里演绎出人的本性。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人类解放，不管它的最终形态是什么，它都意味着人能够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本真面目去存在、去展开、去活动；意味着人不再需要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耗费在那种被迫的、异化的、为了谋生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上；意味着人身上那些独特的、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的爱好、他的审美、他的判断、他那些“我之为

我”的特性——能够得到释放，而不是被压抑、被抹平、被碾碎成一个标准化的零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过那个著名的图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²⁶。这个图景的核心是什么？是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当下的兴趣，去自由地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它的全部实质，就是人的个体特性、人的本我，不再被分工、不再被生存的强制所束缚。

用这个尺度去看今天：当一个人不必再把全部生命耗在糊口上，当他开始能够把内心的爱好释放出来，能够因为自己独特的审美、独特的兴趣，去和同样独特的人相遇、相知、相连——这难道不正是那个“上午打猎、下午捕鱼”的自由图景，在今天的一个微弱然而真实的预演吗？

农业时代的农民，他从来没有这种奢侈。他的全部个性，都被生存的重担压平了；他不知道自己除了种地还喜欢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知道。工业时代的工人，他的个性被流水线碾碎了；他被固定在一个局部的工序上，他的独特性对资本来说毫无价值，资本需要的只是他可以被替换的劳动力。而今天，终于有一部分人，开始有了一点余裕，去发现“我喜欢什么”“我是谁”。

如果这还不算是进步，那又有什么是进步呢？

第三节 需要的丰富，是人的丰富

我们还可以再往深里走一步。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²⁷这段话讲的是需要的社会性质——人的需要不是固定的、自然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的。

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新联结，至关重要。

农业时代的农民，他的需要是极其贫乏的。他的全部需要，几乎都被压缩在“活下去”这一个最基本的层次上——吃饱、穿暖、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喜欢别的什么，因为他没有机会去发现。工业时代的工人，他的需要稍微多了一点——他开始要求更好一点的工资、更短一点的工时、让孩子能上个学。但他的需要，仍然紧紧地围绕着物质生存的改善。

而今天，人的需要已经向上生长出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人们开始需要被看见、被承认；需要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需要在一个理解自己的共同体中获得归属；需要过一种“是我自己”的、而不是“标准化零件”的生活。这些需要，在农业时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不是因为古代人“没有这个基因”，而是因为那个生产力水平根本没有提供让这些需要冒头的余裕。

所以，当我们说今天的新联结是进步的，我们说的不仅仅是“人们有了更多消遣”。我们说的是：人的需要本身，丰富了。而人的需要的丰富，就是人的丰富本身。一个人需要得越多、越复杂、越超越于单纯的肉体生存，他就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真正的人。资本主义在它的历史阶段上，曾经用它那无情的金钱关系，把人的一切关系都简化为交换关系——这是它的破坏性。但是，同一个资本主义，通过它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也第一次为人的需要的全面展开，准备了物质条件。它一方面把人变成劳动力要素，另一方面，又在这个要素之外，释放出了人身上那些更多的、更丰富的、还没有被它完全吞没的需要。

²⁶ 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德意志意识形态》

²⁷ 马克思，1849，《雇佣劳动与资本》

这就是矛盾所在。人发展出了更丰富的需要——审美的、认同的、自我实现的——而资本却仍然要把人压平成一个标准化的、可替换的劳动力。人的丰富性，与资本所要求的标准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就是我们下一章要展开的那个核心矛盾。

我们现在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为什么那些守旧的左翼同志，会在二次元、在小众爱好、在身份政治面前，感到那样的愤怒和不安。他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些东西和他们心目中那个“纯粹的”、围绕着工资展开的阶级斗争，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把这种不一样，直接判定为“堕落”，就错了。他们没有看到，这种不一样，恰恰是人的需要、人的丰富性本身的进步。他们怀念的那个“纯粹的工人”，其实是一个需要被压缩到只剩肉体生存的人。而今天的人，已经不愿意再做那样的人了。

这种不愿意，是进步的。问题只在于，这种丰富的需要，将被引向何方。

第四节 残羹冷炙的警告

但是，我们必须立刻在这里踩下刹车。

说这种以爱好与个体特性为核心的联结是进步的，这只是我们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我们还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它是否构成矛盾的运动？它是否会、以及如何会，走向与斗争的重新结合？

因为事情还有另外一面。

如果这种联结，最终不能指向斗争；如果它不能被真正的阶级斗争——那个作为地火的本质——所统摄、所引导；如果人们只是在自己的小爱好、小圈子、小确幸里，彼此慰藉，彼此取暖，却从不把这种联结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量——那么，这种联结，就仅仅是物质生产的大解放所撒下的一点点零散的残羹冷炙。

它会是什么样的？它会变成一种精致的、自我封闭的、去政治化的消费文化。人们在小众爱好里获得慰藉，在身份认同里获得尊严，却把这一切都停留在私人的、审美的、不触动现有秩序的范围里。他们以为自己在解放自己，实际上却只是在资本主义为他们划定的那个休闲与消费的圈子里，自得其乐。他们的联结，不威胁任何人，不挑战任何制度，不推动任何历史的进程。

如果是这样，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写到我们这个时代时，最多只会在某一个脚注里，一笔带过地提一句：那个时代，因为物质生产条件的大发展，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精神层面的、审美层面的解放——然后就没有了。仅此而已。那些形形色色的爱好共同体、身份政治运动，将被记录为这个富裕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有趣的、可供研究的、却终究没有触动历史根基的东西。

这不是危言耸听。今天的大量新联结，确实就处在这种危险之中。它们释放了人的个性，却没有把这种释放转化为斗争；它们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却没有把这种解放推向社会的解放。它们是进步的萌芽，但这个萌芽，如果不被矛盾的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就会枯萎。

于是，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这种以爱好与个体特性为核心的新联结，究竟如何才能与斗争联系起来？当它与斗争联系起来之后，它又如何与那个作为地火的本质——阶级斗争——重新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矛盾，究竟是如何运动的？

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了本书理论上最核心的部分。

第六章 矛盾的展开

第一节 两种相反的要求

现在，我们终于触到了这个时代最深层的那个矛盾。

让我们把这个时代同时存在的两种相反的要求，并排放在一起。

一种要求，来自人本身。我们在前两章已经反复说明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群众——不仅是在个体的层面，甚至是在群体联结的层面——已经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多样化、要求个体性、要求本我的展现。人们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标准化的、可以被随便替换的零件。他们要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要张扬自己独特的身份，要过一种“是我自己”的生活。这种要求，是物质生产的巨大进步所释放出来的，是历史的进步，是人的解放的一个真实的步骤。它是正当的，它是不可阻挡的。

另一种要求，来自资本。

资本要求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在《要素的枷锁》²⁸一书中，已经用了整整一本书的篇幅做过系统的论证。这里，我们只把那个核心结论再简要地重复一遍，以便没有读过那本书的读者也能立刻跟上我们的思路。

资本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内在的、不可遏止的冲动：把劳动力变成一个可以被识别、被衡量、被安排、被占有——一句话，被“要素化”——的东西。

什么叫要素化？我们界定过它的四个要件。第一，劳动力必须能从劳动者身上分离下来，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指认的对象。第二，它必须能被衡量、被比较、被通约为一个统一的尺度。第三，它必须能被安排、被调配、被按照资本增殖的需要组合起来。第四，它必须能被占有——从属于资本，服务于资本。这四个要件——可分离、可衡量、可安排、可占有——构成了劳动力要素化的完整逻辑。从原始社会末期劳动力第一次从血缘共同体中浮现，到奴隶社会它被赤裸裸地占有，到封建社会它被半人身地束缚，到资本主义社会它被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再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它被算法全方位地规训——整部文明史，就是劳动力被一步一步地要素化、被从人身上剥离得越来越彻底的历史。

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要素化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深度。资本不再满足于在工作时间内支配工人的体力与智力。它通过算法、平台、数据，把它的触角伸向了工人的全部生命过程——他怎么休息、怎么社交、怎么学习、怎么娱乐，都被纳入了一个可以被衡量、被优化、被占有的框架。我们在那本书里把这叫做资本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私人掌控。资本要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可计算的、可替换的、随时可以被它调用和消耗的劳动力。

现在，请把这两种相反的要求，并排放在一起看。

人要求的是什么？是做一个独特的、不可通约的、本真的自己——要张扬个性，要释放审美，要表达那些“我之为我”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资本要求的是什么？是把这个独特的人，重新压平成一个标准化的、可衡量的、可替换的劳动力要素——要他服从算法的调度，要他接受绩效的考核，要他在平台的框架内生产可被提取的数据，要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转变成可以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材料。

这就是这个时代最根本的矛盾之一：人对个性自由的要求，与资本对劳动力要素化的要求，正面相撞了。

²⁸ 张皓翔《要素的枷锁》[EB/OL]. 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753290>

第二节 当“个性”本身也成了商品

这里，我们必须把这个矛盾讲得更现实一点，因为否则它就会显得过于抽象。

资本对个性的压制，并不是像暴君一样，简单地禁止人们张扬自己的特点。那样的压制，是容易反抗的。真实的资本，要狡猾得多，也深刻得多。它有一个更厉害的办法：它不压制个性，它把个性买下来，再卖回去。

这是数字资本主义一个惊人的新现象。

人要求独特，要求表达自己的审美，要求过一种“是我自己”的生活。资本立刻就嗅到了这里面的商机。于是，我们的独特性，我们的亚文化，我们的小众爱好，我们那个“做我自己”的愿望，全都被资本变成了一门生意。我们喜欢某种小众的音乐风格？好的，这里有专门为我们这样的人设计的衣服、唱片、社交账号、生活方式品牌。我们认同某种身份？好的，这里有专门面向我们的文化产品、情感内容、消费场景。我们追求“做自己”？资本会告诉我们，做自己的方式，就是买下这些标新立异的商品，加入这些精心设计的社群。

我们在《要素的枷锁》²⁹里分析过，数字资本的一个核心扩张方向，就是从工作场，转向生活场。它不再满足于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剥削我们，它要在我们休息、娱乐、社交、追求个性的每一个时刻，都把我们转化为一个可以被提取价值的节点。我们的每一次滑动、每一次停留、每一次为某种“独特”的东西点赞，都在被数据化、被提取、被用来优化那个剥削我们的算法。我们以为我们在自由地做自己，实际上，我们的“做自己”，已经被资本编进了它增殖的链条。

这就是当代矛盾最令人窒息的地方。它不是简单地说：“我们想张扬个性，我不准。”而是说：“我们想张扬个性？太好了。请按我给我们设计的方式张扬。我们的个性可以有，但它必须是可以被消费、可以被变现、可以被我从中提取数据和利润的那种个性。”

甚至当今的左翼界，也难逃这种无孔不入的收编。这正是我们前面要反复批判那些将十九世纪工人上街、工厂罢工的图景当成阶级斗争唯一形式的人的原因所在。当左翼把自己的反叛姿态凝固化、把街垒和旗帜变成一种供人瞻仰的“激进景观”时，他们恰恰不自觉地配合了资本的逻辑——因为在这种固化中，真正的阶级斗争被降格了，被物化了，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消费、可以被变现、可以被要素化的商品。人们去购买那些印着切·格瓦拉的T恤，去为某种被包装出来的“反抗姿态”点赞，资本在算法的黑箱里，微笑着收下了这笔流量带来的利好。

我们必须戳穿这个幻象。资本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我们重新举起某个标语、某种旗帜，甚至不是街头的某个具体仪式。它真正恐惧的，是我们哪怕在没有传统旗帜、没有响亮口号的今天，依然能够精准地洞穿它自我更新的统治逻辑，依然能够开展出适配于当下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却直指其根基的斗争。地火并不需要特定的火山口才能燃烧，当旧的火山口被资本同化为一处观光景点时，矛盾运动的本身就会逼迫着地火去寻找新的裂痕。哪里有真实的矛盾，哪里就会生长出真实的斗争。

于是，那个矛盾就变得格外尖锐了。人确实要求在个性，确实要求在释放本我，确实新的联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本身，已经被资本殖民了。我们在这个空间里越是自由地“做自己”，我们就越是在为资本生产数据、生产流量、生产剩余价值。我们的解放，成了新的剥削的燃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如果这种联结不能走向斗争，它就会退化成为一种精致的、去政治化的自我安慰。因为资本已经提前在这种新联结的内部，修好了它的剥削装置。它等着

²⁹ 张皓翔《要素的枷锁》[EB/OL]. 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753290>

我们，等着我们在追求个性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又变成了它的材料。

但是——这里就是辩证法起作用的地方——正因为资本把它的统治，扩张到了个性、审美、身份这些最私人的领域，它也就把它的矛盾，扩张到了这些领域。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这些领域里追求的那种真正的自由，是无法通过消费来实现的。买多少标新立异的商品，加入多少精心设计的社群，都不能真正改变那个把他们当作可替换要素、把他们的生命过程当作可剥削材料的制度本身。那种“做自己”的自由，一旦被推到它的边界，就会撞上那个坚硬的、不能用消费来逾越的墙——那就是资本的统治本身。

这面墙，就是把联结推向斗争的那个客观的压力。

第三节 人不能不联结

这个矛盾，为什么必然会导向斗争？我们还需要再走一步。

这里要引入一个我们反复引用的、马克思的基本命题：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³⁰。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他不可能脱离联结而孤独地存在。哪怕我们说今天的联结已经变成了一种“原子化”的形式——远程的、松散的、随时可以断开的——它也仍然是联结。原子之间，仍然有那三种相互作用力。人需要认同，需要归属，需要在和别人的联结中确认自己是谁。这种需要，是刻在人的存在结构里的，是资本也无法取消的。

于是，资本就陷入了一个它自己解决不了的困境。

一方面，它必须把人要素化——把人变成标准化的、可替换的、孤立的劳动力原子。数字算法把外卖骑手变成一个个独立调度的节点，把程序员变成各自为战的模块，把用户变成一个个可以被精准推送的流量。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在持续地生产着原子化——它需要彼此竞争、彼此孤立、无法联合的劳动者，因为那样的劳动者最容易被支配、被压低、被替换。当然这里不是说资本要完全孤立每一个劳动个体，他当然也需要劳动者的连接也需要分工，只不过资本需要的是符合资本利益，按照资本要求，按照要素化要求进行连接的，不是人的联结、而是零件的连接。

但另一方面，人又不能不联结。人那种要确认自己、要归属、要和同类相遇的需要，是压不住的，人需要的从来不是零件的连接，而是人的联结。我们可以把他从村庄里拽出来，可以把他从工厂里拆出来，可以让他和邻居形同陌路，但是我们压不住他在网络上、在各种新的共同体里，去寻找那些和他有同样爱好、同样身份、同样感受的人。³¹

资本能怎么办？它既需要人原子化，又发现原子化的人正在以一种它无法直接控制的方式，重新联结起来。它不能禁止人联结——因为那等于取消社会本身；但它又害怕这种联结，因为一旦人们联结起来，一旦他们在联结中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处境，联结就会转变为斗争。

这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开始显现的地方。

第四节 联结必然转化为斗争

让我们把这个辩证过程，一步一步地推演出来。

人要联结，这是他的本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在今天的条件下，他联结的中心，是爱好、是身份、是个体特性——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

³⁰ 马克思，1845，《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³¹ 本文对“联结”与“连接”做概念区分：所谓联结，是人作为完整主体开展的社会互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不局限于分工体系内的生产协作；而连接，是资本主义分工中将人拆解为劳动要素与零件之后，由资本逻辑组织起来的技术性关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生产要素之间的搭配关系。

但是，这种联结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是在资本对劳动力的全面要素化与私人掌控之中发生的。每一个在网络上寻找同好、寻求认同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被资本要素化了的劳动力——他是一个被算法调度的骑手，一个被绩效考核的程序员，一个被流量逻辑支配的内容创作者，一个被“假休息”掏空了注意力的平台用户。他在自己的联结中所追求的那种“做自己”的自由，恰恰是他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被最彻底地剥夺了的东西。

于是，矛盾就来了。他越是在联结中追求个性、追求本我、追求那种被承认的尊严，他就越是切身体会到：在资本的统治下，这种个性根本无法真正实现。他在网络上可以是一个张扬的、有趣的、独特的“自己”，但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得回到那个被算法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岗位上，还是得做一个可替换的劳动力。他所追求的那种解放，与他实际所处的那种被要素化的处境，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当这种对立被足够多的人、足够普遍地感受到的时候，联结就必然地、内在地，开始向斗争转化。

这不是哪个先锋队强行灌输的结果，而是矛盾运动本身的逻辑。人们在为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尊严而联结的过程中，会一步一步地发现：仅仅在审美上、在文化上、在身份上“做自己”是不够的；要真正地实现那种个性的自由，就必须改变那个一直在把他们压平成标准化要素的力量本身。那个力量，就是资本。那个一直被掩盖在身份政治、文化斗争表象之下的、真正的对立面，就会一步一步地显露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斗争是必然要显现的。在劳动力要素化与资本对生命过程的私人掌控的条件下，在人对个性自由的强烈要求下，这种矛盾不可能长久地停留在“大家各自在小圈子里自我安慰”的状态。它必然要把联结推向斗争。

第五节 旧貌换新颜

但是——这一点极其重要——这种在新联结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斗争，必然不会再以十九世纪那种轰轰烈烈的赤色运动的形式出现。

为什么？因为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动。

十九世纪的工人斗争，是建立在工厂这一具身的、共享物理空间的阶级联结之上的。它的组织形式——工会、政党、街垒、总罢工——都与那种具身的、集中的、面对面的工人共同体相匹配。

而今天的斗争，它的联结基础，是那种以爱好、以个体特性为引力的、原子化的、远程的联结。它的组织形式，它的动员方式，它的议题设置，它的斗争节奏，必然都是新的。它不会再是几百个工人在同一个工厂大门口一起罢工；它可能是成千上万个分散在各地的人，因为同一个议题、同一种身份、同一种感受，在网络上同时发声、同时行动。它很难再举着一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统一大旗；它会有无数个不同的议题——性别、环境、种族、性取向、各种被压迫者的尊严——每个议题背后，都是一种特定的个体特性的引力。

这就是当代斗争的现状。它已经在那里了，只是我们不认识它——因为我们拿十九世纪的旧地图，去寻找今天的新大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坚决地拒绝那种简单地斥责这些运动“不够阶级”“偏离了正轨”的做法。我们不否认这些运动的斗争性、革命性、进步性——因为它们确实是人在资本的全面要素化之下，为了捍卫自己的个性与尊严而进行的真实反抗。

但是，我们也同样不否认它们的局限性。

这些新的斗争，有一个根本的局限：它们在表现形式上，错位了。

什么叫错位？它们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时代的表现形式；但是，由于引力核心已经暂时地从利益转移到了爱好与个体特性，它们在表面上，却表现为各种身份政治——表现

为女性与男性的对立、不同种族之间的对立、不同性取向之间的对立、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对立。阶级的那个共同的、本质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被这些更直接、更感性、更扎根于个体经验的对立，暂时地遮蔽了。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运动，在形式上，倒退回了前阶级斗争时代的某种状态。它们让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错位成了身份之间的斗争。人们互相之间为了身份、为了文化、为了认同而争执、而对立，却没有——至少在目前还没有——把这些对立，追溯到那个共同的阶级根源上去。

但是，这里我们要再次动用我们的评判标准。这种“错位”，不是一种过错，不是某些人有意识地背叛了阶级，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阴谋得逞了。它是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一种必然的、暂时的表现。

我们再强调一遍：我们不做道德上的正误判断。说这些运动“倒退回了前阶级斗争形式”，不是在骂它们。我们是在客观地指出它们的历史位置：它们是阶级地火在新的引力条件下，喷出来的一种暂时的、错位的形态。它们有进步性——因为它们捍卫了人的个性与尊严；它们也有局限性——因为它们还没有把那个真正的共同敌人识别出来，还没有把引力核心重新汇聚到阶级利益上去。

而这一切——这种错位的状态，这种张力，这种“已经在斗争但还没有认出自己真正敌人”的局面——都不会是永恒的。它是一个过渡。矛盾还在运动，它必然要把这种错位，推向一个更高的、重新统一的阶段。

第六节 那些在身份与阶级之间摇摆的运动

让我们从抽象的辩证，落回到具体的运动上，看一看这个“错位”，在现实中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过去几十年里，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新社会运动，几乎都符合我们这个分析框架。

#MeToo 运动³²是一个典型。它直接的引力核心，是作为女性的生存经验——是那种在职场、在公共空间、在亲密关系中被骚扰、被贬低、被客体化的切身体验。它在极短的时间里，把成千上万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国家的女性，通过共同的身体经验，瞬间地联结了起来。这是一种扎根于个体特性深处的、强大的引力。而这个运动，在形式上，确实表现为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对立，表现为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对峙。在它最激进的时候，它甚至被批评为“分裂了工人阶级”，因为它把性别这一条线，横切了原本以阶级划分的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表面，就会发现，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内在地包含着一个指向阶级的方向。因为它所反对的那种性骚扰、那种权力不对等，在权力顶端，恰恰是和经济上的、阶级上的权力高度重叠的——是那些掌握着资本、掌握着话语权、掌握着雇佣关系的人——资产阶级大家长——才最有能力对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施加这种侵害。一个好莱坞的制片人，可以用一个角色的机会，去胁迫一个渴望成名的女演员；一个工厂的工头，可以用一份工作，去胁迫一个走投无路的女工。这里面的性别压迫，从来都是和阶级压迫、和雇佣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等，缠在一起的。运动在它的起点上，抓住了性别这一最直接、最切身的引力核心；但是，它越是深入，就越会撞到那个背后的、关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阶级地基。

33

³² MeToo (“我也是”)：一场始于网络、旨在揭露性骚扰与性侵害经历的社会运动，鼓励受害者说出自身遭遇，以此打破沉默，揭示权力不对等下的性暴力问题。该运动 2006 年由塔拉纳·伯克提出，2017 年在好莱坞性侵丑闻后大范围传播。

³³ 与两性关系、性别压迫问题，可以参照本人的前序作品《人的生产总罢工：Geschlechtsliebe、婚姻家庭与劳动力解绑》【书稿免费下载链接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2281634>】关于两性问题、性别压迫的深层次次

气候运动是另一个例子。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在学校门口独自坐下来，举着“为气候罢课”的牌子，几年之内，就点燃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青年运动。这场运动的引力核心，是一种超越于个体之上的、对整个星球未来的深切忧虑——它介于爱好与长远利益之间。它把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阶级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恐惧——对一个被烧毁的未来的恐惧——而团结了起来。在表面上，它的对立是“现在这代人”与“未来的世代”之间，是“保护环境的良知”与“追逐利润的短视”之间。

但是，这个运动同样会在深入中，遇到那个阶级的地基。因为气候变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人类”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具体的、谁在排放、谁在受害的阶级问题。那些最严重地污染着地球的，是少数最大的能源公司、是最富裕的国家与阶层；而那些最先承受气候灾难的——被淹没的岛国、被干旱席卷的农民、被热浪袭击的城市贫民——却是那些几乎没有排放过任何碳的人。运动越是成熟，就越是不得不直面这个不平等的结构：要真正解决气候问题，就不能只靠道德呼吁，而必须触动那个以利润为唯一动力的生产体系本身。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错位”的真实面目。这些运动，在它的起点上，以性别、以环境、以身份为引力核心——这是它们之所以能够迅速动员起来的原因。但是，它们都内在包含着指向阶级的方向。它们不是与阶级无关的；它们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时代，被暂时地、错位地，穿上了身份的外衣。

而今天这些运动的不成熟之处，也恰恰在这里：它们大多还停留在那个身份的、议题的层面，还没有——在整体上——把那个背后的阶级地基，自觉地承担起来。它们反对性骚扰，却还没有彻底地追问那个产生性骚扰的权力—经济结构；它们抗议气候变化，却还没有准备好去挑战那个产生气候变化的积累逻辑。它们是对的，它们是进步的，但是它们还没有走完那段从身份到阶级的路。

那段路，不是靠理论家在书斋里指出来就能走完的。它要靠矛盾本身的推动——要靠那个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正在逼近的巨大变局，把这些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推回到那个共同的阶级地基上去。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们必须正面地处理一个躲不开的理论对话。因为不处理它，前面这一切论述，就很容易被人归类到一个我们绝不愿意进入的阵营里去。

我们的论述，乍一看，和当代西方的某些激进理论，有一种表面的相似性。

自从拉克劳与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³⁴一书中，宣布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本质主义的阶级主体”已经死亡，提出要用一系列“话语”链接起来的、多元的、分散的主体立场，来取代那个统一的无产阶级主体以来，西方左翼就沿着这条路，发展出了一整套“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在这套话语里，阶级不再是历史的中心，革命主体也不再是那个统一的无产阶级；取而代之的，是女性、黑人、同性恋、环保主义者、各种身份群体——无数个分散的、围绕着不同“对抗”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通过一种“领导权”的链接，松散地联合在一起。政治的目标，也不再是推翻资本、消灭阶级，而是激进民主的不断扩张。

坦率地说，我们对身份政治、对新社会运动、对那种围绕着个体特性而展开的斗争的重视，在表面上，和拉克劳、墨菲有某种可以辨认的亲缘关系。我们同样不认为今天的斗争会再以十九世纪工人政党的那种旧形式出现；我们同样承认，今天的反抗主体是多元的、分散的、围绕着各种具体的压迫形式而组织起来的。

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把我们与他们的根本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个界限，决定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后马克思主义者。

那个根本的区别，就在我们整本书反复强调的那个地基上。

拉克劳与墨菲，在宣布阶级本质主义死亡的时候，把那个地基也一起抽掉了。在他们那

经济学批判与出路的讨论

³⁴ 拉克劳、墨菲，1985，《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里，所有的“对抗”——性别、种族、阶级、文化——都是平权的，都是话语建构的，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根本。阶级斗争，被降格为无数种“对抗”中的一种，甚至不再是那个决定性的。历史没有一个客观的地基，政治没有一个最终的动因；一切都是话语链接的偶然游戏，一切主体都是被话语建构出来的。于是，“无主体的政治”取代了阶级斗争，激进民主取代了对资本的颠覆。

而我们的框架，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抽掉地基的做法。

我们说今天的斗争以身份、以爱好、以个体特性为引力核心，这只是在说表现形式。我们从来没有、也绝不承认，这些身份之间的对立，是没有地基的、是和阶级平起平坐的。我们从第一章起就反复申明：不管斗争披什么外衣，它的本质、它的地基、它那个在远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仍然是阶级的斗争，仍然是那个由物质生产与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根本对立。性别压迫、种族压迫、文化排斥，这些不是与阶级并列的“独立的对抗”，而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地基之上生长出来的、最终要被追溯到这个地基上去的历史现象。

这就是我们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我们之所以重视身份政治，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和阶级斗争是平权的、多元的终点；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它是阶级斗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暂时的、时代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必经的、有进步性但也有局限性的环节。我们之所以不为它唱赞歌，不是因为我们鄙视这些运动；而是因为我们看到，它还没有完成——它还没有认出自己真正的敌人，还没有把引力核心重新汇聚到那个共同的阶级利益上去。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那个统一的阶级主体死了，所以政治就只能是多元主体的偶然链接。而我们认为，那个旧的、工厂时代的阶级斗争形式确实死了——这一点我们和他们一样清楚；但是，那个作为地火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死，它正在新的联结形式中重新孕育，它终将被矛盾运动本身，重新推到历史的前台。我们不等待哪个话语的偶然链接，我们等待的是矛盾运动的客观进程——是那个把分散的身份斗争，重新逼回到共同阶级利益上去的物质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论述不会滑向后马克思主义那个“无主体的政治”。因为我们始终站在那个地基之上：地火从未熄灭，它只是在等待下一个喷发的时刻。

而那个时刻，正在被一种全新的、我们所有人都身在其中的技术变革，迅速地逼近。

第七章 引力机制的重新统一

第一节 矛盾的解决不能靠喊口号

我们已经走到了整个论证的关键处。

前面说过，今天这些以爱好与个体特性为引力的新斗争，虽然进步、虽然在矛盾中生长，但它们是错位的——它们把阶级斗争的本质，暂时地表现成了身份之间的对立。要让这场运动重新与阶级斗争达到统一，本质上需要做一件事：重新把那个以利益为核心的引力机制，发掘出来。

这里必须立刻澄清一个极易产生的误解。我们说要重新发掘利益的引力，这绝不意味着，哪个先锋队、哪个政党、哪个领袖，可以靠一番宣传、一次号召、一场组织工作，就把今天这些分散在各种身份与爱好中的人，重新喊回到旧的阶级旗帜之下。

如果事情真这么简单，那就太好办了。

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引力核心的这种重新汇聚，不是哪个主观意志所能强加的。当然，先锋队和政党需要做它的工作——它要去分析、要去把握、要去在已经生长起来的新联结中播下自觉的种子、要去把那些分散的反抗引向它必然的方向。这些工作极其重要，我们一点

也不轻视。但是，这些工作本身，不能凭空制造出那个客观的条件。它只能加速、澄清、自觉化那个已经由矛盾运动本身所准备好的过程。

用我们一贯的话说：这仍然是时代矛盾运动的一个产物，而不是哪个人的天才设计。

那么，这个矛盾运动本身，究竟将通过什么样的客观机制，把那个以利益为核心的引力，重新推到历史的前台？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们那本《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³⁵里，已经做过系统的理论推演。这里，我们同样只把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的部分，简要地重述一遍，以便读者把握那条把一切重新贯通起来的逻辑。

第二节 AI：正在逼近的大变局

那个正在逼近的客观力量，就是人工智能。

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在学院派学者眼中，极其危险和极端的预言：在未来少则 20 年，多则 50 年，一场大规模的失业狂潮，将以我们今天难以完全想象的规模，席卷全球。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科幻小说的幻想。它是从我们对劳动力形态的分析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趋势。

在那本书里，我们做过一个关键的区分。马克思把劳动力定义为人在生产使用价值时所运用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这个定义在工业时代是完全准确的，因为那时这两者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无法分离。但是，随着人工智能与智能化机器的出现，这个“总和”的内部，裂开了一道根本的缝隙。

一道裂缝的一边，是那些可以被流程化、被标准化、被分解为步骤的劳动——不管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流水线上的体力劳动，早已经被工业机器大规模地替代；而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接管那些曾经专属于人类脑力的工作——法律文书的撰写、财务数据的分析、程序代码的编写、平面设计的产出。这一类劳动，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可流程化、可标准化、可复制、可预期。而这，恰恰也是人工智能最擅长模拟和替代的东西。

另一道裂缝的另一边，是那种不可流程化、不可标准化、不可复制的东西——我们在《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一书中称之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的不可复制的判断，赋予事物以独特意义的审美，在不确定性中做出的价值决断。这种能力，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可以放大，但它无法真正替代，因为它凝结着一个活的个体全部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那道裂缝的一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以体力与智力之总和为内容的传统劳动，正在被人工智能与机器系统性地排挤出去。

这就是那场失业狂潮的真实含义。它不是说有一天人会全部饿死——不是。它更像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的使用、机床的推广，曾经大量地削减了对手工劳动力的需求。当年，织布机曾经把成千上万的手工织工抛到街头，那些愤怒的人曾经起来捣毁机器，因为机器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今天，历史正在以一种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方式，重演这一幕——只不过这一次，被替代的不仅是体力，还有曾经被认为是人类最后堡垒的脑力。

但是，如果我们的预言仅仅停留在“AI 将造成大量失业”，那它就和市面上那些关于“无用阶级”的流行说法没有任何区别了。我们必须做得更精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决定整个论证成败的区分——社会性的生存危机，与生理性的生存危机。

这是一个必须讲透的区分。

在农业时代，一个农民面临的生存危机，是生理性的。旱灾、蝗灾、战争，会直接颗粒

³⁵ 张皓翔 《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 [EB/OL]. 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17028>

无收，会直接饿死人。那种危机，是肉体的、生物性的——我们没有饭吃，我们的身体就会衰竭、死亡。它直接通向生理的死亡。

而 AI 时代将要大规模降临的那种生存危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当 AI 把绝大多数劳动都接管了之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工业革命相比农业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AI 时代相比今天，生产力更将获得一次史诗级的飞跃。机器不仅没有减少社会的财富生产能力，反而把它放大到了一个今天难以想象的程度。东西会更多，会更丰富，会更容易生产出来。从纯物质的角度看，人类第一次有能力把稀缺从物质生产这个领域里，几乎彻底地驱逐出去。

那么，在这样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里，为什么人还会面临“生存危机”？

这就是要害所在。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分配框架下，一个人要获得生活资料，只有一个途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社会把“有工作”和“能活着”死死地绑在了一起。当 AI 把对劳动力的需求大规模地消灭之后，成百上千万的人，就被从这个唯一的获得生活资料的通道里，抛了出去。他们不是因为社会养不活他们而多余——社会的生产力完全养得起他们。他们多余，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制度下，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被资本剥削、可以为资本增殖做出贡献的劳动力商品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性的生存危机。

它不是生理性的——从物质生产能力上说，社会完全有足够的东西来养活每一个人。它是社会性的——是那个把“劳动—工资—生存”绑定在一起的社会关系，断裂了³⁶。一个人失业了，他首先失去的，不是面包（至少在技术的可能性上不是），而是他在这个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是他作为一个“有用的劳动者”的社会身份，是他借以获得生活资料的那个社会通道，是他的社会尊严。

但是——这一点必须讲清楚，否则我们会陷入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这种社会性的生存危机，它的主观表现，却又确实是和饥饿、贫困、甚至生理性死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为什么？因为只要那个资本主义的分配框架还在，一个被抛出去的人，他就真的会付不起房租、看不起病、养不起家，真的会在街头流浪，真的会在极端的情况下饿死、病死。社会性生存危机之所以能在人身上造成活生生的、肉体的痛苦，恰恰是因为那个旧的分配关系还没有被打破——它一方面用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完全有能力养活所有人，另一方面又通过工资这条狭窄的通道，把那些不再被需要的人，推向真实的贫困与饥饿。

这就是这种危机的辩证法：它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制度的，而不是物质匮乏的；但它在人的主观体验上，却表现为和生存、和饥饿、和死亡一样紧迫、一样切身的危机。

第三节 为什么它通向阶级斗争，而不是更深的原子化

这里，我们必须正面回答那个最致命的诘问。这个诘问是：为什么 AI 带来的大规模失业，不会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导致一种更彻底的原子化、一种更深的去政治化——就是资本用福利、用娱乐、用算法，把这些被抛出去的人养起来、安顿好、麻痹掉，让他们在一边看着短视频、领取微薄的救济，安安静静地、不再反抗地度过余生？为什么我们反而断定，

³⁶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个体层面的，我们在强调，这一时代大变局映射在个体主观层面，会造成怎么样的个体意识的动荡，以及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主观上的虚无。在宏观层面，资本主义仍然会做着垂死的挣扎，它仍然会维持着宏观层面雇佣劳动的存在，以及劳动—工资—生存的捆绑。至于在宏观层面，这一矛盾如何威胁着资本主义的统治，我们可以参照《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一书。

它会把阶级斗争重新逼到前台？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它恰恰是整个未来判断中最脆弱的一环。我们必须把它想透。

我们的回答，建立在三个相互支撑的论点之上。

首先，这种社会性生存危机，是普遍的、同时的、可见的——它不再能被溶解为“个人的失败”。

我们在《要素的枷锁》³⁷里分析过，资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系统性的矛盾，转化为个体层面的体验。一个人“内卷”，被说成是他不够努力；一个人“倦怠”，被说成是他心理调节不好；一个人穷，被说成是他能力不行。在这种叙事里，每一个人的痛苦，都被记在了他自己的账上，他看不到这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性的力量。

但是，当失业狂潮来临的时候，这套叙事就失效了。因为这一次，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一群边缘人失败了——而是成百上千万的、曾经有工作的、受过教育的、自认“中产阶级”的人，在同一时刻，被从他们的岗位上抛了出去。一个程序员失业了，他还可以安慰自己“是我不够优秀”；当他发现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整个行业里成千上万的人都同时失业了，他就再也无法用“个人失败”来解释这一切了。危机的普遍性、同时性、可见性，会自动地、不可阻挡地，把那个共同的、结构性的敌人，推到每一个人的面前。

这时候，“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就不再是哪个理论家建构出来的，而是被这场共同的冲击，硬生生地、客观地划出来的。

其次，今天那些被我们看作“去政治化”的原子化联结，恰恰会在这场共同的危机中，转化为新的阶级团结的物质基础。

请回想我们前面的分析。今天的人，他们确实不再在同一个工厂里具身地聚在一起了；他们的联结，是远程的、网络的、围绕着爱好与身份的。但他们毕竟是联结着的——他们在网络上有成千上万个同好，有无数个可以快速沟通、快速动员的渠道。这些渠道，在平时，看起来只是用来交流爱好、寻求慰藉的；但是，当一场普遍的生存危机袭来的时候，这些已经存在的、密集的、跨地域的联结网络，就会震荡之间，从“文化交流的场所”，转变为“政治动员的场所”。

这就是这个时代与十九世纪的一个根本不同，也是我们之所以对斗争的形式有信心的原因。十九世纪的工人，要从零开始去建立联结——在工厂里认识彼此，在酒馆里讨论，慢慢地组织起工会。而今天的人，联结的网络早已铺就，它只是还没有被用于斗争而已。一旦那个共同的物质危机把他们推到同一个对立面上去，这张早已存在的网络，就会立刻被激活。他们不需要再像十九世纪那样，在街垒旁边从头学习如何团结；他们已经团结过了，只是团结的内容，需要被矛盾重新定义。

最后是资本自己，它没有办法同时驯服这几百上千万被抛出去的人。

我们前面分析过，资本在数字时代用来麻醉人的那套装置——算法成瘾、信息茧房、“假休息”、注意力的剥削——它是需要成本的，它是建立在把人重新塞回劳动过程、塞回劳动力再生产的轨道之上的。资本之所以要费尽心机去控制我们的休息、我们的社交、我们的注意力，是因为它要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明天回到岗位上继续被它剥削。

但是，当大规模的失业到来，当几百上千万的人已经不再是可被剥削的劳动力的时候，资本还有什么动力、还有什么资源，去维持那套昂贵的、全方位的生命政治装置，去把每一个失业者都精致地安顿好、麻痹好？它对那些还在岗位上、还能为它创造剩余价值的人，也许还愿意下本钱；但对于那些已经被证明不再有利可图、不再能为它增殖的人，它会有那种慈善的耐心吗？

更根本的是，我们在那本书里已经论证过：资本的全部运动，都建立在对活劳动的剥削之上。一旦 AI 把它可以剥削的那种活劳动——那种可流程化、可标准化的传统劳动力——

³⁷ 张皓翔《要素的枷锁》[EB/OL]. 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753290>

大规模地替代掉，资本自己的价值源泉，就开始枯竭了。一个没有活劳动可供剥削的资本，就像一个没有血液可以吸吮的吸血鬼，它自己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它不是选择去“安顿”失业者，而是它根本就没有能力再维持那个旧的社会契约了。它要么在生产的绝对过剩中崩溃，要么在对意识的殖民中走向存在性的毁灭——而这两条，都是死路。

所以，那种“资本会用福利和娱乐把失业者养起来、麻痹下去”的想象，低估了这个体系自身的危机。它把资本想象成了一个无所不能、无限慷慨的主宰；而实际上，当它把几百万、几千万人抛出去的时候，它自己也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它没有余裕去温柔地安抚它亲手制造出来的这个庞大的、失业的、愤怒的群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断定这场危机通向的是阶级斗争的重新显现，而不是更深的、被麻醉的原子化。

第四节 自觉的工作与矛盾的必然

这里，我们要把那个在第六章开头被悬置的问题，重新接回来。

我们说，利益引力的重新汇聚，是矛盾运动的产物，而不是哪个政党可以靠宣传强加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人可以袖手旁观，坐等历史把一切安排好。

这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时刻守住的辩证法：客观的必然性，从来不会自动地、完美地实现自己。它要通过人的活动、通过人的自觉，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我们在《要素的枷锁》里讲过那个比喻：历史的定点是星辰，它标定了航向，但水手仍然要驾船。船可能被风浪打翻，可能触礁沉没，可能在迷雾中迷失。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自觉的组织——那个被叫做先锋队、或者政党的东西——它的位置在哪里？

它的位置，不在那个“制造”矛盾的地方。矛盾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由 AI 的崛起、由资本自身的运动所客观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人能代替这个过程。它的位置，在于“澄清”与“凝聚”。

当那场普遍的社会性生存危机降临，当成千上万的人第一次共同地、切身地体验到那个结构性的敌人的时候，他们的愤怒是真实的，但是他们的认识，一开始必然是混乱的。他们会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叙事之间摇摆：有人会把愤怒引向外国人，引向移民，引向某个族群——那是民族主义的叙事；有人会把愤怒引向身边同样失业的同胞，引向上帝，引向自己的命运——那是认命的、犬儒的叙事；也有人会把愤怒引向那个真正的、共同的敌人。

自觉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混乱中，帮助人们把他们真实的、切身的愤怒，引向那个正确的方向。它要在那些已经生长起来的新联结——那些围绕着爱好、身份、尊严而结成的共同体——内部，播下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我们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这个身份群体单独的问题，而是所有被资本要素化、被资本抛出来的人共同的问题。它要帮助人们看到，性别、环境、文化这些具体的斗争，最终是通向那个共同的阶级斗争的道路，而不是替代它的终点。

这种工作，不能代替矛盾，但是它可以加速矛盾的成熟，可以减少矛盾在行进中走的弯路，可以避免那种愤怒被错误的叙事——被民族主义、被法西斯主义、被那种把矛头对准同胞的恶毒叙事——所劫持。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当一场普遍的危机来临，如果自觉的力量软弱、混乱、无所作为，那么那个真空，就会被最反动的力量所填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坚持引力机制的重新统一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又绝不轻视主观的、自觉的组织工作。历史的必然性是星辰，但驾船的，仍然是人。

现在，我们可以到达全书论证的终点了。

让我们把两条线索合起来。

第一条线索：AI 带来的大规模社会性生存危机，会把那个以利益为核心的引力机制，重新推到历史的前台。当几百上千万的人同时面临着被从社会分工体系中抛出去的危险，当他们同时发现自己和别人共享着同一个处境、面对着同一个敌人，那种对物质生存条件、对社会地位、对分配正义的切身争夺——也就是利益——就会重新成为把他们凝聚起来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核心。阶级斗争的那个核心引力机制，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重新显现了。

第二条线索：我们前面反复论证过，以爱好、以个体特性为核心的新联结，是历史的进步。它释放了人的个性、人的审美、人的本我。而这一点，在 AI 时代，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因为劳动的解放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因为当那个可流程化的旧劳动被机器接管之后，人就从那种被迫的、异化的谋生劳动中，被解放了出来；他终于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那些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爱好、创造、审美之中去。那个“上午打猎、下午捕鱼”的自由图景，第一次获得了它的物质基础。

请看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工业时代，利益的引力与个性的追求，是分裂的、对立的。工人为了生存而被迫出卖自己，他的个性被碾碎在流水线上；他斗争是为了活下去，而不是为了发展个性。利益是沉重的、被迫的，个性是被压抑的、没有机会展开的。

而在 AI 的未来，这两者第一次统一了起来。

一方面，普遍的社会性生存危机，把最核心的利益问题——关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关于谁支配谁的劳动——重新推到了斗争的中心。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为了社会地位、为了那个决定他们命运的根本制度而斗争。利益的引力，重新成为核心。

另一方面，经过这几百年、特别是这几十年的发展，人的个性、人的精神需要、人的爱好与本我，已经被历史培育出来了，它们不会因为一场失业危机就消失。人们斗争，将不仅是为了面包；他们还要为一个能够让他们的个性自由展开的社会而斗争——他们要的不是一个仅仅发救济金、把他们养起来的社会，而是一个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作为人的独特能力、能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

于是，利益的引力，与爱好、个体特性的引力，不再是互相排斥的了。它们结合在了一起。人们为捍卫自身生存条件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同时也就是一场为了让人的个性能够真正自由展开而进行的斗争。那个在工业时代被生存紧迫性所压倒、被异化劳动所压抑的人的丰富性，将第一次成为斗争目标的一部分。

这就是引力机制的重新统一。

如果说，十九世纪的工人联合是：“为了活下去，我们不得不压抑并放弃个体特性，拧成一股无名的绳”；

那么二十一世纪未来的联合则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特性、兴趣爱好与自由发展获得真正、持久的实现，我们必须在阶级利益上坚定地联合起来！”

那个作为地火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熄灭过。它在民族的面具下流了上千年，在工厂的烟囱下直接喷发了一个世纪，又在今天这个原子化的、以爱好与身份为联结的时代，暂时地错位成了身份政治。而现在，一场由 AI 所掀起的巨大变局，正在把这个错位的形式，重新校正到它的本质上去。利益的引力回来了，而那个进步的、关于个性自由的追求，也没有丢失——它们将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合流为同一个历史运动。

到这里，我们的论证，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让我们在最后，把这本书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我们从一个问题出发：阶级斗争，还在不在？

我们的回答是：它一直在。它是地火，是那个不变的、由物质生产所决定的地基。但是，把人们凝聚起来、让地火得以喷发的那个火山口——联结的引力机制——却在历史中不断地迁移过。

在农业—封建社会，这个火山口是民族。匮乏的物质生产把群众压在生存的重担之下，只有统治阶级有余裕把斗争当作自己的事业，而民族这件外衣，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也最能把群众安全地动员起来。于是阶级斗争作为地火，被压在了民族的战袍之下。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这个火山口复归于阶级。蒸汽机把工人集中到了工厂里，生产力的相对发展给了他们一点点余裕，让他们第一次可以为切身的利益而斗争。于是阶级直接地、不加掩饰地，成为了凝聚被压迫者的核心。《国际歌》就是这个时代的歌声。

而在我们身处的数字时代，这个火山口又一次迁移了。它分裂为两端：一端是国家层面重新被现代装置系统生产出来的民族，另一端是个体层面以爱好与本我特性为圆心的新联结。阶级叙事沉寂了，身份政治兴起了，原子化的联结取代了具身的共同体。

面对这一切，我们拒绝两种错误的姿态。我们不宣布历史已经终结——那是把形式的死亡误读为本质的死亡。我们也不转过头去责备群众堕落了——那是对历史主体的亵渎，是把十九世纪的旧图画当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

我们用历史的尺子去衡量：以爱好与个体特性为核心的新联结，是进步的。因为它意味着人第一次有了一点余裕，去释放自己的本我，去追求那种“我之为我”的展开——而这，本来就是我们全部斗争的最终目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局限：这种进步，如果不能被矛盾运动推向斗争，如果不能重新与那个作为地火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就会退化成为一种精致的、去政治化的自我安慰，成为这个富裕时代的一点文化残羹。

而推动这种统一的，不是哪个天才的设计，而是矛盾本身。人对个性自由的要求，与资本对劳动力要素化的要求，正在这个时代正面相撞。这种矛盾，必然把今天那些围绕着爱好与身份的联结，一步步推向斗争。而最终把这一切重新贯通起来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掀起的那场巨大变局——它以一场普遍的社会性生存危机，把利益的引力重新推到历史的前台；它又以生产力的史诗级解放，让人的个性第一次获得了自由展开的可能。利益与个性，这对曾经分裂的两端，终将在新的历史基础上重新合流。

这就是我们对“革命团结与联合”这个老问题，给出的时代新解。

什么是今天的团结？它不再首先意味着，人们因为住在同一个村庄、在同一个工厂、受同一个老板直接剥削，而自然地凝聚成一个整体。那个旧的具身团结的物质基础，确实已经松动了。

但团结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建立在那些新的联结之上——那些因为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身份、共同的尊严处境而在网络上相遇的人们。这些联结，在平时看起来是松散的、去政治化的、甚至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是，它们是真实的，它们是进步的，它们是那个即将到来的新团结的物质胚胎。

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不是站在一个想象出来的道德高地上，去唾弃这些新的联结“不够纯粹”“不够阶级”。不是幻想把十九世纪的街垒重新搬进二十一世纪。而是要走进这些已经生长起来的新联结之中，去理解它们，去尊重它们的进步性，去在它们内部，培育那种走向斗争的自觉；去帮助那些为性别、为环境、为尊严而斗争的人们，一步一步地认识到：他们各自面对的那个具体的敌人，最终是同一个；他们各自追求的那个“被承认”的尊严，最终只有在改变了那个把人要素化、把人压平、把人变成可替换零件的制度本身之后，才能真正实现。

我们不把旧的斗争形式强加给新的时代。我们只是诚实地指出：地火还在，火山口已经换了，而那场终将把一切重新贯通起来的巨变，正在敲门。

一切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判断，今天没有过时，今后也不会过时。它只是再次提醒我们：要看穿那些纷繁变幻的面孔——民族的面孔、阶级的面孔、身份的面孔、爱好的面孔——一直看到那个从不退场的、作为地火的本质上去。

面孔会变，地火不熄。

而那些在地火中锻炼、在新的联结中团结起来、最终把利益的引力与个性的自由重新统一起来的人们，将不仅失去他们身上的锁链。

他们还将赢得那个真正属于人的世界。